

# 美国史研究通讯

The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11 年第 1 期

(总第 106 期)

主 编：王 旭  
副 主 编：胡锦涛 韩 宇  
责任编辑：胡锦涛

出 版 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出 版 地：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1 年 9 月 1 日

本通讯的内容亦刊登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

[www.ahrac.com](http://www.ahrac.com)



# 目 录

## ◆庆祝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

- 平常的经历 肤浅的感受·····张友伦 (1)
- 张友伦先生自述·····张友伦 (5)
- 答谢八十生日祝贺(七言古诗)·····张友伦 (7)
- 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原祖杰、秦珊、张聚国、杨令侠 (8)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致张友伦教授贺信····· (29)
- 致张友伦先生的贺信·····王旭 (30)
- 祝贺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黄安年 (31)
- 致张友伦先生贺信·····梁茂信 (32)
- 悠悠寸心谢师恩——敬贺业师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李剑鸣 (33)
- 祝贺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徐国琦 (36)
- 点滴师恩 一生难忘——敬贺业师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陈奕平 (38)
- 南开从师记——为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而作·····高春常 (39)
- 仰望星空 沐浴恩泽——敬贺恩师张友伦先生喜迎八十华诞·····毕健康 (43)
- 《美国历史的多重面向——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
- 前言和目录·····李剑鸣 杨令侠 (45)
- 张友伦教授论文和著作目录·····杨令侠 (48)

## ◆书评◆

- 《国家干预与 1865-1935 年间的美国经济转型》评介·····高春常 (51)

## ◆学术信息◆

- 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 开启历史学发展新阶段·····刘潇潇 (53)
- 南开大学举办“美国族裔与社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张聚国 (55)
- 东北师大举办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与文化交流会议·····欧阳贞诚 (55)
- 美国三一学院格林伯格教授和南开大学王黎博士在鲁东大学讲学·····赵慧 (56)
- 美国三一学院格林伯格教授在武汉大学讲学·····谢国荣 (57)
- 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翟强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学·····宋丹 (58)
- 美国科尔盖特大学郝吉思教授、加兰教授访问厦门大学·····杭垚 (59)
-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 Songho Ha 教授在东北师大讲学·····欧阳贞诚 (60)

## ◆会员动态◆

- 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揭晓 我会会员斩获六项····· (61)
- 国务院聘请我会顾问时殷弘教授为国务院参事····· (61)

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在陕西师大讲学·····	杭 垚 (61)
北京大学王希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学·····	张聚国 (62)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在广州讲学·····	孔庆山 (63)
福建师大王晓德教授在广州讲学·····	张震山、李 晶、曾颖姗 (64)
厦门大学盛嘉教授在南京大学讲学·····	曾 全 (65)
中国社科院徐再荣研究员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做学术报告·····	(66)
◆新书讯◆·····	(67)
◆会议预告◆·····	(68)
第十四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暨“全球视域中的美国史研究”学术讨论会通告··	(68)
第八届美国研究网络年会暨“美国‘软实力’与社会平等”国际研讨会预通知··	(69)
编后记·····	(71)

## ◆庆祝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

# 平常的经历 肤浅的感受

张友伦

光阴荏苒。80个春秋不可谓不长，但回首往事又觉得并不遥远。1959年，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从青年到老年，与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朝夕相处，多少知道一些他们的追求和难处。但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谈何容易。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并不是都很清楚，往往要去查书，临时抱佛脚。这使我很紧张，但也受益良多。所以我对“教学相长”这句名言是深有体会的。唐代文学大师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事实正是如此，不少学生的成就都超过了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否则社会就很难进步了。

不久前，学友们（过去的学生）准备为我出一本80岁生日庆贺文集。我曾再三辞谢。一是因为要耗费他们的时间和钱财，二是因为我不过是千万普通教师的一员，不值得出这样的集子。但终因盛情难却，在他们的坚持下，我只好同意。

作为接受庆贺的人，我总应当写点东西回应和答谢学友们。但搜索枯肠也没有找到独到的治学经验和治学方法，只好把自己的某些经历和感受写出来，就算是姑妄言之，不必当真。

到苏联学习，从世界近代史调到美国史研究室工作，是我的两次不平凡的经历，既是极好的机遇，又是巨大的困难。年轻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直到1954年夏天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才知道要去列宁格勒大学学习世界历史。我原来是学会计的，中国历史还多少知道一点，世界历史可就太陌生了。俄语没有学过，全靠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二部强化学习一年那点可怜的基础。到国外名大学学习自己几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刚开始，在课堂上简直是听天书。课后热情的苏联同学又给我解释一遍。我还是云里雾里，不得要领。最后只有靠看书来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一节课下来要付出七、八个小时才能弄清基本内容。学习是十分紧张的。当时留苏学生中流行一句话：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我不是怕困难的人，但想到期末考试就不寒而栗。只好走一步看一步。第一年的难关度过后，学习逐渐走上了正轨。在这段时间我总担心跟不上进度被送回国。如果没有苏联同学和老师的耐心帮助，我真的要掉队了。

1977年，我被调到美国史研究室工作。虽然是历史学科的内部调整，但涉及到使用语种和研究方向的改变，没有三四年的时间是很难适应的。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看书离不开字典，一小时不过看一两页，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如果三两年内不能突破，那就拿不出研究成果，也不能接待来访的美国学者。这等于让我第二次留学，面对留苏初期那种困难。而这次我已将近50岁了，精力有限。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背水一战。记得有两年时间，脑子里装的都是英语，整天听录音、练口语，看英文书。现在回想那

些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过去的。

我提到上述两段经历，只是想强调在困难面前不要动摇、不要回避。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所收获。

厚积薄发是大家都承认的治学态度。但青年教师积累不多，发表几篇文章是不是就触犯了原则？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世界历史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即使只选择某个断代作为研究方向，那也很难做到厚积。而且厚积又没有共同的尺度，也许十几年过去也没有达到发表文章的标准。青年教师等不起。如果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以具体题目为突破点，范围小了，厚积的难度就会小许多。发一点东西也就指日可待了。

另外，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都是对观察问题、把握问题能力、逻辑思维、写作技巧、文字水平的全面检验和锻炼，有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定要求青年教师一写惊人，那就是强人所难了。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即使积累厚了也不见得能发出什么东西。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是谈基佐的阶级斗争学说，只有 3000 多字，发表在《天津日报》上。1963 年才开始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篇幅较大的文章。同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我写的外国历史小丛书《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动笔写这些东西以前，自以为很有把握，但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缺漏，促使自己再查阅资料，使原有的积累有所扩展和提炼。《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我大学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指导教师要求我阅读所有有关的著作和《马恩全集》中的论述。这应当是我积累最厚的课题。即使这样，发表之前也要不断查阅资料。可见发的过程也是拓宽和加深积累的过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也许几十年后再回头看最初发表的文章会感到幼稚、肤浅，但不必为此羞愧和后悔。因为学术界和刊物也是在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当初的文章能够发表就表明达到了那个时期的要求。如果那个时候不敢发表，以后就更不敢写，更怕拿不出手了。归根结底，把握现实，不放过任何机会才是最重要的。我这样做了，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这样做。我不但向他们宣传动笔写作的重要性，而且尽可能给他们创造发表文章的机会。我相信凡是这样做了的同学都会有所收获的。

在研究室工作，教学工作较少，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是考察业绩的主要指标。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数量要求，但也有不小的压力。有关世界史的刊物本来就很少。对于毫无名气的新手来说，发表文章尤其困难。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规定了研究人员每年发表论文的篇数，后来甚至要求研究生也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以上文章才能取得答辩学位论文的资格。我至今仍然觉得这个规定不大符合实际。粥少僧多，实在让研究生为难，也让导师们大伤脑筋。

其实当初没有规定数量指标时，日本史、美国史的研究人员也都是勤勤恳恳，力争上游的。那时候两个研究室合用一个大办公室，中间只隔一排书架。我曾几次听到他们讨论向《历史研究》投稿的问题。《历史研究》是全国的顶级刊物之一，对稿件要求很高。没有深厚的功底、创新的意识是很难被采用的。我佩服他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同时也以此来鞭策自己。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 1984 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量化也许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管理方法，但绝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得不当很容易引发弄虚作假的歪风。激发和引导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说起写文章自然要涉及一个人的文字表达能力。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系统学过国学，文字功夫不是太好，写起文章来非常吃力。我没有研究过国学。记得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解过，我并不真懂，简单地认为国学就是研究古人传世之作的学问。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很肤浅的。此后由于环境的变更再也没有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幸好我在上小学时利用暑假念过几次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当时只是死记硬背，根本不懂原文的意义。连书名都不清楚。后来才知道，四书是《论语》、《孟子》、再加上宋人朱熹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和《中庸》。五经是《诗》、《书》、《易》、《礼》、《春秋》。四书念完了，《诗经》只读了几篇。

我应当感谢我的母校蜀华中学。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古文和国学知识。几位语文老师在这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他们的熏陶下，学到了一点国学知识和运用古文的能力。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四库全书》是国学的总汇，所收入的书籍（包括存目）不下一万余种，而未收入的书籍还有很多。经书居全书之首，书目虽然繁多，但以十三经为首。所谓十三经就是前面提到的五经，加上《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唐代以降十三经就是治国的基础，成为文人、学子必读的经典。尽管十三经包含许多精辟的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和文学精华，但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文字也比较难懂，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过。就连我中学时期的老师都绝口不提经书，倒是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谈得不少。

在今天看来，能够在青少年时期获得这些知识是很幸运的。但当时我并不觉得有多么宝贵。说实话，没有老师们的循循善诱，恐怕我不会去学习难懂的古文。由于有了一点古文知识，我在课外常读一些文言小说和《古文观止》上面的文章，同时对历史也产生了兴趣。正史的难度大，又比较枯燥，读得很少，演义、野史之类的书倒是读了一些。

中学毕业后进入了省立成都会计专科学校。这是一所高等职业学校。由四川省政府分配工作，是当时的铁饭碗。我是解放后毕业的，被分配到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工作。三年后被推荐参加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考试。准备时间很少，又缺少参考书籍。我对这次考试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出乎我的预料，语文、历史方面的试题我答得非常好，字迹也比较工整。结果居然被录取了。如果没有这点国学知识和古文基础，这个大好机会就把握不住了。

我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的是世界近现代史。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从事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知道国内杰出的世界史专家都有非常深厚的国学功底。我也深感国学知识对世界史学工作者的重要性。但世界史学工作者往往因为承受学习外语的沉重负担而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也不例外，总是因为时间分配不过来，始终没有系统地阅读国学书籍以弥补自己的不足。退休后想读也没有那样的精力了。羊已亡了，而牢却很难补上。

要求每一位世界史工作者都通晓国学自然是过于苛求了，但多学一点国学知识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首先，孔孟和诸子百家留下的思想财富十分宝贵、十分丰富。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各有千秋，高度概括地、集中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思想、需求和崇尚，其洞察力和深度绝不输于西方的古代思想家。老子（李耳，也称老聃），庄子（名周）是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那时他们就用“道”和“气”来解释世界，否定神造世界的说法。如果只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家而不了解孔、孟、老、庄，就是知识上的一大缺陷。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

其次，国学中的史学书籍同我们学历史的人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史和中国史虽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理论、方法和研究目的却是相通的。学世界史不一定非读通二十四史不可，但应当有所了解。说来惭愧，我迄今未通读过任何一部正史，幸好还多少接触过一些有关书籍。从我所读过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历代著名史家莫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他们当中有人甘冒生命危险也要直书帝王的劣迹。“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古代史官留下的浩然正气，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国学书籍使用的是古文。其特点是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对我们提高写作能力大有帮助。我只是略懂古文，但就这点薄弱基础也使我终身受用无穷。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当年就考不上留苏预备部，此后的命运和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研究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以上这些经历和感受只是随便道来，谈不上什么心得。酒后茶余消遣可也。



# 张友伦先生自述

## 一、解放前的经历到参加工作这一段

1931年5月21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初中和高中都是在蜀华中学度过的。中学毕业后进入四川省立成都会计专科学校。两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工作。1952年入团，195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推荐参加留苏考试，并被录取。1954年8月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

纪念文集“代跋”中有关学习古文的内容可以补充进去。另外，我在读中学时曾由前清举人谢老先生指导过古文写作，有十几次之多。每次由他出题，我写文章，他再批改、点评。我自觉从中受益良多。

## 二、在苏联学习中遇到的巨大困难和面对的方法

可参考“代跋”（第314-315页）。

另外，补充一些克服困难的方法：

1. 坚持预习。开头听课，由于没有预习，几乎完全听不懂，充其量能够捕捉到几个单词和简单句子。后来逐渐发现，课程内容大体上可以在教科书上的有关章节中找到。于是就开始预习，效果很好，对提高听力很有帮助。

### 2. 积极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刚到苏联最欠缺就是口语表达能力。因为整天都在看俄文书，阅读能力提高比较快。听力的提高也比较明显。没有充分地练习口语是很难提高的。虽然我们身在苏联，但是说俄语的机会并不多。上课同苏联同学坐在一起，课间休息才有机会说几句话。但由于我的口语很差，不但结结巴巴，而且往往词不达意。对于还是大孩子的苏联学生实在太乏味了。只有少数有耐心的女同学能够和我聊几句。班上共青团小组发现了这种情况就指定一位品学兼优的女同学帮助我。于是我就有了课后及时练习口语的机会，而且谈话的内容同课程有关。另外，我还结识了一位热心的男同学。我们的宿舍挨得很近。放学后我有机会经常向他讨教。讲话的机会就更多了。不过，让我受益最多的是古希腊、罗马教研室秘书为中国学生组织的特殊的习明纳尔。习明纳尔是在希腊史课后举行。由她提出问题，我们回答。答后她做出点评。那时我觉得这是提高口语能力的绝好机会。每次我都主动发言。最初几次连比带划，也不知道对方听懂没有。后来逐渐顺畅起来。到期末希腊史的考场上，我居然能够比较流利地回答了所有问题，让著名的罗马史专家科瓦廖夫感到满意。

### 3. 面对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必须多练习写作

用俄语写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即使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很难达到能够及格的水平。我只有知难而上。记得在写学年论文的时候都要斟酌再三。主要困难不在语法，而是在用词和句型是否恰当。在请苏联同学修改的时候也发现在这两方面出的问题最多。经过第一次认真的写作才发现平时看书的时候忽略了作者驾驭文字的方法和技巧。此后就有意识地记住书中和文章中常用的句型和词汇。俄文的写作能力才逐渐得到提

高。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轻松了许多。苏联同学帮我校正的时候，只改动了两三处。

### **三、在改变研究方向中遇到的困难和克服的过程**

可参考“代跋”（第 315 页）

补充说明：在一个系内调整工作岗位，改变部门和研究方向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过去我曾经被调到社会主义概论组工作，并没有感到什么困难。但从世界近代史教研室调到美国史研究室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难就难在语种的变化。如果过不了英语关，我就无法胜任工作。我自问还有较强的责任心，不打算应付了事。在其位就必须谋其政，所以只好背水一战了。

我应该感谢杨生茂先生。他为我创造了许多条件，使我有时间、有机会专攻英语。本来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不放我走。几经交涉，还是要求我离开后再为他们讲一年课。最后杨先生决定代我去讲，使我赢得了一年的时间。另外，杨先生每次接待外宾都让我随同，使我得到了许多实践的机会。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我初步具备了同美国专家交流的能力。

1981 年，美国工人运动史专家方纳教授来南开讲学。杨先生让我单独接待。这是对我的一次真正的考核。迎来送往、课程安排和生活方面翻译都比较好对付。但是讲课翻译就相当难了。一般都是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生王心扬承担。有一次方纳教授为历史系全体教师讲课，杨先生让我上去翻译。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杨先生发现我自信不足，马上对我说：“你放心。我给你护航，如真不行，我上去接替你”。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结果很顺利。事后杨先生对我说：“准确度 90% 以上”。我心里想，这次考核大概是通过了，信心大增。以后我在陪同方纳教授出访讲学时，先后在西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做过三次翻译。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有资格在美国史研究室待下去了。

### **四、我对厚积薄发的看法**

可参考“代跋”（第 315—316 页）。

### **五、学点古文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关键**

可参考“代跋”（第 317—319 页）。

### **六、我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考虑**

见《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自序

### **七、我研究美国西进运动史的基本考虑**

见《美国西进运动探要》的“导言”和“后记”。

### **八、应该了解所选择领域的研究状况**

在确定研究方向以后，我一般都要了解这个方向的史学史。当然这种了解是逐步的，以后会逐步加深。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图书资料极度缺乏。我到美国史研究室（1977 年底）后就准备先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我只找到了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1—2 卷（中文）、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1—2 卷（英文）、雷伯克的《美国工人史》（英

文)，还有康芒斯主编的《美国工业社会史文件汇编》10卷（英文）。这些书几乎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版的，对了解当时美国工人史的研究状况没有什么帮助。直到1980年、1981年，伯曼和方纳教授先后来访、讲学，除了口头讲授外，还带了近100本专著，使我眼界大开，受益匪浅，大体上对工人史的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试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在《世界历史》发表（1984年第2期），以后又进一步写了《关于康芒斯－威斯康辛学派》，发表在《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

我在研究美国西部史的时候也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先后在《世界历史》和《南开学报》发表了《关于西进运动史学》（第一作者，《世界历史》，1984年第6、7期）、《美国史学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南开学报》，1995年第1期，《孔见集》附录中漏掉此文）。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选择课题时心里有点底。

2011年3月15日

## 答谢八十生日祝贺（七言古诗）

自问生平无大志  
但求尽责心得安  
平凡之中讨生活  
不曾尤人不冤天  
幸运似风凭借力  
送我进入南开园  
得与诸君共切磋  
教学相长益非浅  
好苗尚须仔细栽  
桃李芳菲已成材  
盛情出书还设宴  
庆我诞生八十载  
情到深处不言谢  
古诗一首表心怀

注：诗不雅，字不好，但却是我的心意。书此聊博学友们一笑。也许几年后还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一丝影子。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张友伦题并识

（此文由张聚国录入，特此致谢）

# 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

原祖杰、秦珊、张聚国、杨令侠

在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美国史学界中，张友伦先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曾担任中国学术界重要职务，还因他的强烈的职业责任心，以及为追求学术进步殚精竭虑、无怨无悔的奋斗历程。他在学术研究、梯队建设和学科谋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老一代和新一代史学家之间的桥梁。他是中国美国史研究承前启后的功勋。

## 一、学术经历

张友伦先生的学习路程和研究经历极其复杂。在他精力最充沛的年华里，我们国家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巨变。

1931年5月21日张友伦先生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初中和高中都是在蜀华中学度过的。张先生的学术视野与文字修养和他年轻时下的功夫关系很大。在小学阶段，他曾利用假期入私塾，初触四书五经。“我应当感谢我的母校蜀华中学。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国文和国学知识。几位语文老师在这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他们的熏陶下，学到了一点国学知识和运用古文的能力”；“在今天开来，能够在青少年时期获得这些知识是很幸运的”；在读中学时他还受过前清举人指导古文写作，张先生“自觉从中受益良多”。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四川省立成都会计专科学校，195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工作。他在1952年加入共青团，195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求理想、积极进步的青年。这奠定了张先生终身的奋斗理念和不惧困难的品格。20世纪中期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他被推荐参加留苏考试，并被录取，1954年8月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张先生原来是学会计的，乘上去莫斯科的火车才知道自己是去学习世界历史。由此，张先生开始了他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重新学习—重新工作的传奇学术生涯。

在苏联学习期间，他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张先生回忆说，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可是一下子把他放在离自己所学所用专业迥异的、异国的世界历史的课堂中，他真的手足无措了。“俄语没学过，全靠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二部强化学习一年那点可怜的基础。到国外名大学学习自己几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开始听课时，他几乎完全听不懂，后来发现预习对提高听力很有帮助。此外，用俄语写作也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然而，在苏联紧张的、日以继夜的学习没有白付出，张先生最终顺利通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并得到苏联教授的好评。鉴于在各个方面展现出的才能，在大学二年级时他担任了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大学三年级时又担任了列宁格勒市的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

1959年张先生从苏联学习结束回国到南开大学工作，曾一度在历史系社会主义概论组工作。在苏联学习的马列主义和世界历史的深厚基础，都使张先生首先选择国际工运

史和国际共运史这两个研究方向。他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表的成果，大都与此相关。而后，他对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至 80 年代末。

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日报》上，内容是谈法国首相弗朗索瓦·皮埃尔·基佐的阶级斗争学说，虽然只有三千多字，但这是他的处女作。1963 年，他投给《历史教学》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也发表了。这篇一万余字的论述 1910—1917 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使用了多种俄文资料，因此内容饱满，是国内极少数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之外的语言研究墨西哥史的文章。张先生对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评介也是中肯和客观的，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当时、即便现在，这篇论文依旧在材料的运用和全球史的视野上独具特色。这篇论文的发表大大增加了这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动力和自信心。此后，他参与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自 1963 年始由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有他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巴枯宁》（合著）和《蒲鲁东》（合著）等部，印数达到百万册左右，还发行过少数民族文字版，是新中国以来国民研修外国史的重要教材。他说，“《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我大学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指导教师要求我阅读所有有关著作和《马恩全集》中的论述。这应当是我积累最厚的课题”。从 1959 年至今，国内学界研究这个方向的论文和著作乏陈，而其中张先生独著与合著的相关著作就有六部册，论文九篇。

张友伦先生早年的研究，尽管也同中国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带有一定程度的时代局限，但其客观、稳健的学风和厚重、平实的文风，保证了其研究成果的持久学术价值，让广大后学受益匪浅。

60 年代初，张先生被调到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工作。在这段教学科研的日子里，张先生先后开设了“世界近代史”等课程。他的研究课题也是与世界近现代史相关的。文革结束后，考虑到加强美国史研究的力量，1977 年底，南开大学历史系内部作了调整，决定把张友伦先生从世界近代史教研室调到美国史研究室。虽然领导也考虑过他的俄语背景，但最后还是做出调动决定，这完全基于多年来对张先生学术能力的认可和人格的信任。在一个系内调整工作岗位、改变部门和研究方向，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研究者语种的变化非同小可。语言是学者的首要功力，而外国语言则是研究世界史的工具，离开它就寸步难行。张先生 23 岁始习俄语，46 岁转学英语，理论上讲，都错过了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他在被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之前，不仅没有去过任何英语国家，而且根本就没学习、接触过英语。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像道钉一样，被放在最需要的地方，而他们的学术轨迹也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他回忆刚调到美国史研究室的情形时说，“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看书离不开字典，一小时不过看一两页，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如果两三年内不能突破，那就拿不出研究成果，也不能接待来访的美国学者。这等于让我第二次留学，面对留苏初期的那种困难。而这次我已将近 50 岁了，精力有限。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背水一战。记得有两年时间，脑子里装的都是英语，整天听录音、练口语，看英文书。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过去的”。在当今语言学习条件和生活水平如此优越的年代，真的很难想见张先生当初面临的困难有多大。这也反映出张先生超人的毅力和服从大局的风格。大约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张先生就具备了同美国专家交流的能力，甚至可以为美国教授讲课做同声翻译。作为中年教师，他顶起了

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屋脊”。用他的话来讲，“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有资格在美国史研究室待下去了”。张先生称这次工作调动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转折点”；“可以说，我对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没有什么基础和准备。转到美国史领域以后一切均需从头做起，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不过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集中研究方向，从头做起，并全力以赴”。由于在过去世界史的教学科研中，张先生偏重国际工人运动史部分，况且在列宁格勒大学读大学期间，他“就喜欢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阅读过程中又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西欧的工人运动有所了解。随后就自然而然地去阅读一些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书籍”；“改变专业以后，我自然倾向于美国工人史。”这是张先生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背景。

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之需，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美国工农业发展道路、西部开发和民主制度建设的著述。80年代末，他还担任过《日美问题论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之一，并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和人文学会理事会学者先后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堪萨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从1981至1997年，他连续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南开学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所有研究成果显示，他是中国人数极少的、留苏学习社会科学中的佼佼者。

然而，张先生研究美国史的学术道路并非就此平坦，很快又受到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转瞬间，电子技术，如互联网、数据库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铺天盖地。年轻学者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这又是一种新的学术压力。可是他依然不停顿地孜孜耕耘，在2005年七十四岁时，他又出版了力作《美国西进运动探要》。年近八旬，张先生总结到，“我对‘教学相长’这句名言是深有体会的。唐代文学大师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事实正是如此，不少学生的成就都超过了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否则社会就很难进步了”。这是一位学术大家的宽阔胸怀。

## 二、学术贡献

张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达20余种。他先后完成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和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大概说来，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国际工人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美国史学史、美国劳工史、美国农业史和工业史、美国社会史、美国西部史等方面。

### （一）史学史

张友伦先生每开拓一个新领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对既往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地了解和梳理。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刚转向美国史研究不久，张先生就发表了“关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史学”一文，对早期美国史的相关研究加以介绍和鉴别：从最早的威廉·戈登·戴维·拉姆齐和乔治·班克罗夫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学派和帝国学派；从20世纪二三十年的经济学派，到二次大战后的和谐史学和60年代的新左派史学，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史研究流派在张先生笔下都一一得到评点。

同样，张先生在着手美国工运史和西部史研究时，首先关注的也是以往的研究成果

和学术流派。张先生回忆到，“在确定研究方向以后，我一般都要了解这个方向的史学史。当然这种了解是逐步的，以后会逐步加深”；“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选择课题时心里有点底。”在了解所选择领域的研究状况时，“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图书资料极度缺乏。我到美国史研究室（1977年底）后就准备先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我只找到了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1-2卷（中文）、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1-2卷（英文）、雷伯克的《美国工人史》（英文），还有康芒斯主编的《美国工业社会史文件汇编》10卷（英文）。这些书几乎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版的，对了解当时美国工人史的研究状况没有什么帮助。直到1980年、1981年，伯曼和方纳教授先后来访、讲学，除了口头讲授外，还带了近100本专著，使我眼界大开，受益匪浅，大体上对工人史的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我在研究美国西部史的时候也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实际上张先生对加拿大史的研究亦循此路。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工运史学的研究殊为丰厚，并有独到见解。他在“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始于何时，可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又都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对于研究美国工人运动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必须回答但又难于确切回答的问题。”而张先生对美国工运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学术脉络：首先是康芒斯学派的崛起。美国第一代劳工史学家来自经济研究领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利在1886年出版了《美国劳工运动》（*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张先生认为这是“系统论述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第一部专著”，但伊利的贡献要远大于此。1892年伊利转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并获得一份3万美元的研究基金。1904年他创建了美国工业研究所，旨在对美国工业社会和劳资关系做系统调查，并邀请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带出的得意门生约翰·罗杰斯·康芒斯主持其事。在康芒斯领导下，威斯康星大学一批经济学和劳资关系学者先后编辑出版了十一卷本的资料集《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和四卷本的《美国劳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张先生评价说：“这两部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和严重错误，但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整整一代人，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具有权威性的美国工人运动史巨著。”张先生对于康芒斯学派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其职业意识论并不认可，但对康芒斯学派在美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却给予充分肯定。

崛起于世纪之交的康芒斯学派，与其他史学流派一样，受到当时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科学的影响，试图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康芒斯是西方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而他在劳工史方面的贡献丝毫不逊色。康芒斯“把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归结为劳资谈判”，“认为美国工人运动是一种纯经济活动，不带有政治性质”。其弟子朴尔曼更明确提出“职业意识”（或“工资意识”）论作为美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张先生对此批评说：作为劳工史学流派的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其理论的核心是所谓职业意识论，其要害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这与劳联的“纯粹的工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先生认为，康芒斯学派的成果及其影响相对较小的挑战者们，包括老左派史学家威廉·福斯特等人的著作，代表了美国第一阶段的工运史学。将菲利普·S.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于 1947 年的出版看作美国劳工史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未必能引起一些美国同行的共鸣,但却代表着张友伦先生在劳工史学方面的独立见解。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 60 年代新一轮社会运动兴起,这中间有近 20 年的政治反动期。一方面,我们看到走过辉煌的康芒斯学派日渐式微,另一方面,50 年代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让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的劳工史学也概莫能外。而能在工运史方面填补空白的,恐怕也只有被主流史学家们视为异端的独行侠菲利普·S.方纳的四卷本《美国工人运动史》。所以,张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阶段划分,要比那些自觉地遵守政治正确性的美国工运史学家更为客观、公正。

张先生认为,60 年代新劳工史学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而促成新劳工史学形成的关键是 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张先生指出:这本书提出了两个新问题:第一,工人运动史决不仅仅是有组织工人工会会员的历史,而是包括非工会会员在内的全体工人的历史;第二,工人运动史决不仅是工人的工厂和车间内的斗争、活动的历史,而是包括工人文化生活在内的历史。这两个问题恰好是康芒斯学派所忽略了的问题。汤普森的皇皇巨著直到 2001 年才由钱乘旦教授等人译成中文,而早在 1984 年就在文章中系统介绍 E. P. 汤普森及其著作的张友伦教授,可能是最早接触汤普森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张先生并不完全认同新劳工史学,但他却花了很大篇幅介绍新劳工史学的来龙去脉、优劣得失,足以反映其客观、理性的学术素养。

张先生将新劳工史学分为三支:其一是汤普森—加特曼学派,强调文化的作用,将“工人文化”置于劳工史研究的突出地位;其二是戴维·蒙哥马利代表的一派,将“工人控制”作为衡量劳工状况的重要尺度;其三是一批从地方史和家庭史角度剖析美国劳工状况的年轻学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加特曼学派对“工人文化”的重视,并将工人的“社会舞台”细化到社区和家庭。张先生认为,同康芒斯学派相比,新劳工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是扩大了研究领域,将少数民族、移民和传统意义上有组织劳工之外的社会群体纳入研究范围;二是将“发觉被人们遗忘了的普通工人的历史”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之一,摆脱了过去只围绕工会上层人物的叙事风格。同时,张先生也注意到美国新劳工史学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关注普通劳工、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同时,忽视阶级斗争和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倾向。

回顾张先生二十多年前对美国劳工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对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更为重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表现出很强的原则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尽一致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他在指出其“错误”倾向的同时,又能完整、客观地加以介绍,为中国的美国史学工作者观察美国社会提供更多的视角,表现出一位严谨学者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良知。在 80 年代初期许多研究领域还禁忌重重的情况下,张先生的良苦用心是难能可贵的。举例来说,张先生虽然对康芒斯学派只重视有组织劳工的倾向持批判态度,但对于这个学派在 80 年代的衰落似乎不无惋惜之情。在列举了这个学派的最后几位代表人物之后,他还特意提到罗伯特·齐格尔(Robert Zieger)为劳联及其领导人的辩解。他写道:“对劳联和保守工会主义的攻击也应当慎重。”他不赞成人们指责“龚帕斯及其助手醉心于组织熟练工人并且总是同大公司



及其政治同盟者进行妥协和合作”，他认为，“敌对的环境极难维持工联主义的生存”，同时“龚帕斯为有组织的工人奋斗了半个世纪，如果他不犯错误，不让步，那才真是令人惊异的”。

在这里，张先生只是引用了齐格爾的话而未作任何评论，读者可以从这种看似无意的缺失中看出作者有意的同情与认可。对于美国劳联等有组织工会在改善工人处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缓和社会矛盾中所起的作用，今天的学者也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但在新劳工史学如日中天的 80 年代，作为中国的美国劳工史专家，张先生的评断显然要更为客观、公正。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西部史学的探讨，也为国内美国史研究作了前期铺垫。

张先生在 1985 年和 1995 年分别发表了“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上、下）和“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再论美国西部史学”三篇文章。前文侧重点放在西进运动，后文从地区史的角度来考察西部史学的发展和问题，基本勾画出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前沿动态。对于美国西部史学在 1981 年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西部史学会年会所遭到的挑战，即西部是不是能够作为独特地区单独存在，有没有所谓的美国西部史问题的提出，张先生在分析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的原因后，根据对西部史的研究，肯定了大多数美国西部史学家的观点，即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西进运动就是西部各州共同经历过的历史进程。正是通过这个共同的历史进程，西部各州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荒凉的原野和丛林变为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人口激增的地区。即使它们发展的程度和速度很不一致，但发展的道路是共同的。从这个角度说，研究西部各个州的过去同研究整个西部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由此推导出美国西部史作为美国历史的一个分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同时他指出了西部地区很多共同性的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发展成为专史，如印第安史、西部城市发展史、西部矿业史和妇女在开发西部过程中的作用等。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根据美国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美国西部史已取得研究成果，张先生指出：“过去西部地区史有许多共同问题可以研究。即使在西部各州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差异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可以研究。应当说美国西部史学尽管遇到严重挑战，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美国印第安史学的兴起”和“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这两篇论文中，张先生探讨了美国西进运动史学的独特分支——印第安史学。张先生介绍了上世纪 60 年代印第安人史学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对印第安人历史研究的方法等，指出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偏见和重新认识、评价印第安人历史的困难。他认为，在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种族主义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印第安人的历史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严重歪曲；这种困难的状况使新的印第安史学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其中清理过去的错误观点，消除种族偏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刻不容缓的课题；由于印第安人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污蔑和歪曲，需要矫正和澄清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就是国内开展印第安史学的研究的一个空间。

张友伦先生在 2005 年新作《美国西进运动探要》中，对西部史学又做出新的贡献。

首先他进一步完善了西部史学史研究。在先前发表的论文中，在研究西部史的方法论上，张先生曾提出了要结合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研究美国西部史学。在《探要》第一章，这一提法发展成“社会史研究对西部史学的影响”，将西部拓荒者的生活、活动、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传统习俗和道德观念以及价值观的变化、社区种族的构成和不同种族之间的交往和矛盾以及妇女的地位和作用都系统地涵盖到西部史研究的范围中。其次，在《探要》中，张先生对国内西部史研究状况的介绍也发展为独立的一节，将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分为：评价特纳和边疆学说、介绍和论述西进运动史学、评介西进运动、西进运动和美国农业大发展、西部公共土地私有化和美国政府政策和美国领土扩张等方面的论述，较全面地介绍了国内史学界美国西部史研究状况，既肯定了国内现有研究的成绩，也提出了研究的发展空间。

张先生在美国西部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推动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一是有助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认识掌握美国的研究概况，二是提出了可研究的专题空间，三是在探讨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过程中，张先生对史料也进行了介绍与识别，为后来者提供了详实的文献综述，减免了在查找资料时所花费的消耗。

总之，张先生对美国工运史学史和西部史学史的研究，在宏观方面，紧密地与美国社会发展相联系，详细地考察了其演变过程中的社会变革需要；在微观方面，则通过对西部史学史家和历史著作、历史观点的评介，丰富了国内美国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为国内的美研究可以达到和美国学者沟通、对话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

## （二）劳工史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承接了他早期有关国际工运史的研究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总是具有一种宏观的比较视野。从80年代初开始，张先生将美国劳工史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从1982年到1997年发表了包括文章和专著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开辟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为后来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张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向国内学术界评介美国劳工史研究动态。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是文革之后出现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改革开放之初的美国史研究，很多地方还能感受到过去的意识形态制约，基本上是以政治批评为主。当时作为美国史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其主要科研方向仍然延续着对美国外交上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内政上的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揭露和批判。现在有的学者对于过去一些带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已经不屑一顾，甚至全面否定。岂不知，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即使在标榜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学术倾向。而真正扎实的学术研究，是不会因为其所拘于的某些意识形态框架而丧失其本身学术价值的。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就不会有中西学术界对现代国家制度、社会结构乃至人类文明的全面思考及其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观察南开的美国史研究，我们也不难发现，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全面介绍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深刻分析，包括杨生茂先生对美国扩张本质的透视与批判、对美国史学流派的评介与梳理，都是我们后来更为全面地研究美国社会与文化、内政与外交的

基石，有着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并没有被动接受当下一些流行的美国史学派系的影响，而对独立于美国主流史学之外的劳工史专家菲利普·S. 方纳的研究格外垂青。

活了 84 岁的方纳一生出版了 100 多部专著，对于并不追求发表数量的美国学者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这或许要归功于年轻时遭受的政府迫害所激发的写作斗志。出生在纽约的方纳是俄国移民的后裔，1932 年从纽约城市大学毕业后，又先后于 1933 年和 1941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方纳就开始任教于纽约城市大学，而在获得博士学位后，31 岁的方纳就因其思想激进与他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其他 60 名同事一起，被纽约州议会的拉普—库德特调查委员会（Rapp-Coudert Committee）辞退。这个委员会旨在对纽约高等教育中的亲共分子展开调查，而受到波及的显然不只是大学教师。被清退的人员中还包括菲利普·方纳的三个兄弟：任历史系教授的孪生兄弟杰克，在注册处工作的穆尔以及在一所纽约中学代课的亨利。这样违反人权的事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也许难以置信，但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却是司空见惯的。失去教职的方纳只好到一家出版社任职。政府的迫害并没有泯灭方纳的学术热情，他在 1947 年出版了其成名作《美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卷，表现出对美国历史上工人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重视，从此奠定了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位。方纳偏左的学术立场让他在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上赫赫有名，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团体之外，而在前苏联和中国却是最受欢迎的美国学者之一，他的《美国劳工运动史》先后在两个国家出版。大约 30 年后的 1979 年，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向拉普—库德特委员会的受害者们道歉，这对于许多被迫放弃他们的教学生涯而转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来说已经为时已晚，方纳虽然也受害颇深，但其学术研究并没有中断。1967 年，美国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方纳得以重新回到学术界，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主要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林肯大学任教，直到 1979 年退休。方纳一生可谓著作等身，除了他的代表作十卷本的《美国工人运动史》之外，他还撰写和编纂了上百种其他著作和文件集，主要涉及美国劳工组织和黑人劳工群体等领域，其成果之丰富，在当代美国史学界独领风骚。美国当代学术界不乏特立独行的反潮流斗士，而能够像菲利普·S. 方纳那样勇敢地面对政府的迫害和学者同行的排斥的人却并不多见。

早在 1956 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63 年，第二卷也由同一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美国史专著，当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国史学者接触到的第一批美国史著作。张先生在转到美国史教研室之前曾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任教，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美国史，但由于他在国际工运史方面的兴趣和研究，对方纳的著作并不陌生。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以后，他选择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既是个人背景和兴趣的作用，也是政治环境使然。而菲利普·方纳及其著作，对张先生早期美国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1981 年，菲利普·方纳作为中美建交以后邀请的第一批美国学者，来到了当时的中国美国史重镇南开大学，张友伦先生担任全程陪同，并在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师大和苏州大学的演讲中亲自担任翻译。之后，他根据方纳的演讲和研究成果撰写了两篇

文章，分别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和《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对方纳教授眼中的美国劳工史学和美国现代史学进行了系统介绍。

方纳的美国劳工史代表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1947年《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菲利普·S. 方纳马克思主义学派诞生了”。方纳美国劳工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挑战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的“职业意识”论，强调美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张先生根据方纳的演讲，将方纳与康芒斯学派的区别总结为如下几点：1. 方纳教授不否认美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但必须承认美国工人运动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共同性，即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存在着阶级斗争。2. 方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是产生过积极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美国工人运动都做过贡献。例如，美国工人在内战前积极投入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号召的结果。甚至劳联的成立也是同马克思主义战胜拉萨尔主义有直接关系的。龚帕斯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点。3. 方纳主张写所有工人的历史，其中包括妇女、黑人工人、华裔工人以及所有少数民族工人的历史。而康芒斯学派则只写劳联和白人工人的历史。4. 康芒斯学派只注意工会运动的发展，完全无视美国工人阶级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例如，他们的著作中有两章专门讲殖民地时期的劳工运动却没有提到独立战争中美国工人阶级的活动和贡献。方纳的著作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除了对康芒斯学派的批判之外，方纳还向中国学生介绍了当时正在美国崛起的新劳工史学。而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E. P. 汤普森作为新劳工史学的奠基人也是由方纳首先介绍给中国学生的，张友伦先生又根据方纳的演讲，首次将这位传奇式人物及其划时代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然而，当年的中国学者经历了长期的封闭禁锢，大多数人还难以充分领会汤普森学说的学术价值，直到 E. P. 汤普森本人得到邀请于 1985 年访问中国，他要在南京大学演讲的消息首先在各国留学生中引起轰动，才让中国学者意识到“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张先生虽然认可方纳所强调的汤普森学说的贡献，即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史”和“工联以外广大工人的活动史”的强调，但对于美国的汤普森——加特曼学派的学术方向却并不完全赞同，认为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工人的文化是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美国工人运动唯一重要的研究课题”。张先生对美国新劳工史学的批判态度无疑受到了方纳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对国外学术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自他本人的独立判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美国学术界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尽管许多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一种学说的流行自然会形成对其他学说的压制，但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标新立异，因此也就听之任之。而张友伦先生等中国学者却不必受美国主流学派的影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择善而从，选取的是一条正确的学问之道。具体而言，张先生取方纳而舍新劳工史学既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持守，也一点不违背他的学术良知。只是后来中国学术氛围的变化让劳工史学逐渐边缘化，也影响了新劳工史学在中国的介绍。

从 80 年代初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学术钟摆在补偏救弊的同时也在向另一个方向摆动：过去学者不敢问津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又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而对于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却因审美疲劳而逐渐淡化。其实，

对人权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一直是知识分子良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方纳在逆境中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着眼于对工人、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本来就应该受到中国学者的尊敬和学习。而张友伦教授可能是受方纳学说影响最著的中国学者，“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与方纳在学术上的相通之处。

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的第二个贡献是开创性地用国际比较视野来研究美国工运史。

张先生在转向美国史研究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甚至在从事美国史研究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对国际共运史的关注，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散见于《历史教学》、《世界史研究动态》、《国际工运史研究资料》、《国际工运史研究》、《美国研究》和《河北师院学报》等期刊或连续出版物。张先生对国际共运史资料谙熟于心，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在欧美各国的活动观察细微，对国际共运组织和人物的评价有很好的把握，其深厚的研究功力尤见于“重新评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 1848 年革命中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理论意义”和“第一国际纽约总委员会和北美联合会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等重头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张先生在国际共运这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下研究美国共运和工运，自然带有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比较意识，其判断也就更为稳妥、全面。张先生发表于 1996 年的“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一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早期美国工人运动的理解，在此结合张先生其他著述略加评析。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没有经受过革命风暴的考验，也没有经历过激烈的阶级对抗，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合法斗争形式。”在这里，张先生将美国早期工运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进行比较，发现欧洲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早期的反封建斗争中还是后来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中，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诉求。例如，法国工人就在二月革命中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要求。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工人关注的却是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争取缩短工时”，另一方面通过选票“把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选进地方政府和议会”。张先生指出，关键性的差异在于“美国工人已经得到了选举权”，而欧洲工人则不然。

根据张先生的观察，“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二是理论上的贫乏和思想上的混乱”。与欧洲相比，美国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自然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但是没有系统的理论不代表没有任何思想。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建立在新大陆的移民社会，不仅在种族上，而且在思想上表现出多样性；除了各地移民带来的复杂思想之外，新大陆特殊的自然环境也为这种多样化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张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过的德国移民克利盖。后者曾提出把美国尚未落入投机分子手中的 14 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以此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张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歪曲共产主义，误导广大民众的思想给与了驳斥和批判；并认为此类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工人队伍的思想混乱，从而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三是其“和美国工人党的成立同时开始的”，而美国工人党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人政党，缺少应有的纲领和章程，“纯粹是为竞选而组织起来的，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也没有经常的党务工作”。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四是工人运动开端早，但工人阶级形成晚。在张先生看来，“西欧的工人运动应当始于19世纪30和40年代，而美国的工人运动则始于20年代后半期”。张先生还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跟方纳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美国工人运动的开端定在1827年的费城。“在那个地方，美国工薪阶层第一次不分行业地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雇主”。尽管已经有了工人的联合行动，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美国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一样还没有固定下来。

张先生所总结的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上述特点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有益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加上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比较视野，让张先生对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观察更为透辟、深刻。研究美国历史总会遇到“美国例外论”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劳工史领域又表现为两个互为关联的具体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和“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缺乏鲜明的阶级意识”。不难看出，这两个问题与上述张先生所总结的第一个特点关系密切。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多年来，美国例外论者一直认为，美国的工人运动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欧洲暴风雨似的运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任何激烈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形式和社会主义目标都是不适合美国国情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的起源。1906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该书出版后，引发美国学者的广泛讨论，并在1911年被翻译成英文，从而也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基石。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埃里克·方纳在内的许多美国著名史学家都参与其中。

张友伦先生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提出客观冷静的评析：首先，“从历史上看，美国并非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国家。恰恰相反，当欧洲刚刚开始流传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美国很快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广阔活动场所。”他举出欧文的试验，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有关美国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沃土的见解，说明“美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故乡”，其实践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准确的例证”。其次，美国（纽约）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在地，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在欧洲革命失败后纷纷来到美国，并在那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党”。1876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现也曾让北美的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一丝曙光，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均未获得充分发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借机迫害和压制左翼思想，阻止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张先生的分析既指出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所获发展的事实，又从实际出发，说明了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在。

此外，张先生还对美国学者围绕桑巴特疑问的解释一一作了评析，包括路易斯·哈茨的“自由主义传统”说和 P. A. 索罗金的“社会流动”说，为中国读者进一步探索、研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全面、详备的学术参考。

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做出的第三个贡献在于他对美国学界关于“职

业意识”与“阶级意识”的介绍与评析。

美国工运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美国工人阶级是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级，有无鲜明的阶级意识的问题。美国学者经常引用爱尔兰出生的《民族》杂志主编戈德金（E. L. Godkin）在 1867 年写的一段话用以说明美国工人与其欧洲同行的区别：“罢工中的（欧洲）工人不只是要求更多工资的劳工，他是社会中一个鲜明阶级的成员，所进行的是一场对其他阶级的合法战争。……他的雇主不只是一个他要求分享其利润的资本家，而且是一个敌对阶级的成员。……如果希望加入其中就会被认为是卑鄙的背叛。不必多说，这样的感情在美国工人中是不存在的。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戈德金时代的美国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工人阶级队伍尚不够壮大，不能说明后来 30 年中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但一些美国学者却将其说成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征，20 世纪初崛起的康芒斯学派更将阶级意识全部抹煞，认为“美国工人阶级从来不具有阶级意识”，美国工人运动只能产生“职业意识”。

对于否认美国工人阶级具有“阶级意识”的说法，张友伦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曾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不少有关美国工人阶级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证据”。事实上，当海伍德在 1905 年 1 月世界产联的预备会议上阐明世界产联的宗旨“是要工人阶级掌握经济权利、生活手段，控制生产和消费机制”时，当他在几个月后的世界产联成立大会上宣布“这个组织将要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和建立”时，当世界产联率领的美国产业工人公开与联邦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为敌，将建立一个行业工会“政府”来管理工业和其他社会活动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大概已经没有人怀疑他们强烈的阶级意识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会对这些公开敌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视而不见，反而强调“职业意识论”呢？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世界产联人数相对较少，活跃时间也不够长久。而大多数美国工人并没有认同激进主义和参与激进活动。康芒斯学派的朴尔曼明确指出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他写道：“对于美国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职业意识’。”尽管后来崛起的新劳工史学不再满足于“职业意识论”解释，强调“工人文化”和“工人的控制”，但“职业意识论”在美国工运史上一直不绝如缕。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总结说：“从总体来看，美国工人运动受工联主义影响极深，总是把眼前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职业意识论’颇有市场”。

与“职业意识论”相关的是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即认为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因此不会出现欧洲那样激烈的阶级对抗。有关美国中产阶级论，最经典的说法来自于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受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托克维尔抱着“中产阶级最有前途”的信念，在美国找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一个缺少封建传统，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并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基础。从此，中产阶级意识成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据称，1940 年《财富》杂志在美国所做的一次调查中，有 80%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中产阶级意识也被看作是消解等级观念和阶级矛盾的一剂良药。工作性质相当、收入水平相近的人，在英国可能会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在美国则会自认为中产阶级。张先生注意到，美国学者对于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

有不同的理解。他引用了范内曼和坎农在《美国人的阶级观念》一书中所采信希腊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波伦查斯的观点，即认为：“中等阶级是使工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阶级结构的一部分，是资本和劳动冲突矛盾中附属于资本的部分。他们和资本家不同，不掌握生产资料，同工人阶级不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他们的任务是管理工人，设计工厂，负责对贫苦工人进行帮助等社会工作。他们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工人。”而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仅存在着客观标准上的不同，还存在主观感觉上的差异；既包括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等通行标准，也包括因种族、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带有倾向性的主观判断。张友伦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各种因素和各种解释都进行了深入剖析，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等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阶级，实际上是中等收入的社会阶层。它本身并不稳定”，又经常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美国学者把许多明显属于社会下层的人物划入中等阶级”，造成概念上的混乱。界定标准上的差异，调查方法上的缺陷（譬如问卷中通过栏目划分误导调查对象）以及包括被调查者在内的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广大民众在主观认同上的倾向性，都造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大化。

张先生通过对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结构的分析，审视了美国社会从早期到二战以后发生的诸多变化，不仅为我们研究美国劳工史提供了指导，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美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 （三）工业史和农业史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中国的美国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崭新阶段。美国快速崛起和稳定发展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学者首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美国经济史成为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他们希望能够从美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探寻有益的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以便能够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经济腾飞提供借鉴。在这种背景下，张友伦先生在1980年发表了“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后来者居上的几点原因”，指出独立革命和内战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解放了生产力；而大力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和农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等措施，使美国在的工业在较短时间内后来者居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不久，张先生与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同仁们抓住了美国经济现代化的两大“助推器”——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推出了《美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农业革命》两本书。

《美国工业革命》是当时中国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的专著。要对美国工业革命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美国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的问题。如在当时，关于美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学术界至少有四种说法：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开始之后不久美国工业革命也相继启动；18世纪90年代；19世纪初期；19世纪50—60年代。张先生赞同第二种说法。他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把1790年美国“制造业之父”塞缪尔·斯莱特引进英国新式纺纱机并应用于美国的纺织工业作为美国工厂制确立的标志，作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关于美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张先生结合马克思的精辟之论提出，用机器制造机器、即机器制造工业的机械化是工业革命完成的主要标志。同时，张先生注意到了美国工业革命地



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美国北部，从 19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用机器制造机器，北方的工业革命也在那个时期基本完成。而南部，由于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掣肘，工业化进程举步维艰。直到内战彻底扫除了南部落后、野蛮的奴隶制毒瘤之后，南部的工业化才走入正轨，并在 19 世纪 80 年代得以完成。

张友伦先生及其同事撰写的《美国工业革命》对于后来有关美国工业革命的研究起到了“铺路架桥”的作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张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就美国工业革命的起讫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在启动时间的问题上，国内有学者提出了 1812-1804 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以及 19 世纪 30-40 年代等说法；而在完成的时间上，则有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 20 年代等不同的说法。可见，张友伦先生等人有关美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在当时确实属于开风气之先。

美国的工业革命的进程并非完全是一路凯歌、创造辉煌的田园诗般的历史。我们在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时，不能忽视其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面。对于这一点，张友伦先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在谈到美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和局限性时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他写道：“美国工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原始积累阶段。跟英国不同，美国的原始积累阶段没有经过圈地运动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而是通过奴隶贸易、剥夺印第安人、剥削移民来进行的。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和圈地运动、殖民掠夺相比较，同样是十分残酷和惨无人道的，在美国工业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暗淡的一页”。张友伦先生在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讲述了美国工业化启动之前殖民地时期以来，剥夺土著美国人土地和生命、非洲黑人的自由和劳动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而对于这一点，多数美国研究工业的学者都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关于美国工业革命的条件，张友伦先生除了分析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和黑人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之外，还注意到了农业、教育、科技、政府政策、移民、交通运输革命和以蒸汽机的应用和普及为标志的动力革命。这些个体的因素后来分别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提出，各国在享受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安逸的同时，为了实现现代化也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代化是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生活方式必然摧毁和取代旧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导致社会失调，暴力（战争和冲突）爆发，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美国工业革命作为美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现代化带来的普遍性问题。张友伦先生指出，美国的工业革命，造成了美国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之很快超过英法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工业革命造成了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的产生和资本、生产、社会财富以及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垄断，由此造成的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 19 世纪末美国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而美国在实现工业革命之后，则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成为一个“对外进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强国”，将拉美和亚洲国家卷入了现代化的漩涡，给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美国工业革命》完稿之后，张先生又转向了美国现代化的另一个重大主题——农业现代化，1982 年发表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并在此基础之上于 1983 年推出了《美国农业革命》一书。全书紧紧围绕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问题，阐述了其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形成过程、特点与性质、影响与局限性。当时

的国内学者，包括张友伦先生，依据列宁的有关论述，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这种道路的基础是“自由农场主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经济”。也就是说，独立的自由农民在“自由土地”上不受封建残余的束缚自由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它不同于改良式的“普鲁士式道路”，即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缓慢而逐渐地走上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农民长期遭受这种改良遗留下的封建残余的压榨和痛苦。

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发展的进程，张先生认为，农业资本主义“美国式道路”的起点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铲除了殖民地时期从英国带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残余，为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奠定了基础。独立战争后国有土地的产生和分配是“美国式道路”开始的重要标志。而内战期间林肯总统颁布《宅地法》实现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造成了大批自由小农，小农自由土地制度的彻底确立，标志着“美国式道路”的形成。而19世纪末期农业资本家和农业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农场在农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即“美国式道路”的最后完成。

张先生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普鲁士道路”的鲜明特点，即“在自由的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获得最纯粹的发展”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式道路”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特点；“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一条革命的道路，代表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趋向具有鲜明的典型性。”这种革命性除了表现在通过独立革命扫除了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之外，更多的是体现在它与生产力发展相辅相成的互动作用。张先生指出：“‘美国式道路’之所以是革命的道路，归根结底就在于它同迅速发展生产力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它不仅比封建制度优越，而且比改良道路优越。在一个多世纪当中，美国的农业生产一翻再翻，一直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地位”。这种论断，在当时社会“左”的遗毒尚未完全肃清的政治气氛下，无疑显示了一位学者的良知和唯真求实的作风。

在张友伦先生之前，国内有学者主要从生产关系变革（即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和农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的角度阐述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张先生认为，农业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与工业革命一样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变革，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他在强调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的一面的同时，也同样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即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机械化。他写道：“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大机器生产就没有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没有农业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美国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一样，由于奴隶制在南部的影响，同样产生了地区性差异，使南部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北部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宅地法》并未触及南部的土地问题。内战摧毁了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之后，出现了大量分成制佃农，保留了一定封建残余，因而南部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基本上属于普鲁士道路的类型”。

张先生也指出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式的道路”的矛盾和局限性。首先，生产“过剩”的危机成为美国农业发展长期存在的“慢性病”。其次，盲目追求利润，滥用和浪费自然资源，乱砍滥伐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大平原

的沙尘暴向沉睡在繁荣与富足中的美国人敲响了来自环境的警钟。第三，美国的农业革命也是建立在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榨取农业雇佣工人的血汗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土著美国人和广大小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土著美国人被无情杀戮，土地被强占，而大批小农则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竞争下走向破产，失去土地，陷入贫困。“‘美国式道路’也是一条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的道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美国的农业是在印第安人的垒垒（原文如此一笔者注）白骨上，用小农的血汗浇灌发展起来的”。可见，美国农业革命作为经济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牺牲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为基础的。

从张先生有关美国农业革命的研究来看，那个时代的中国美国史学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其研究从立论上已经开始出现不同于美国学者的“中国特色”。他们能够依据马恩列斯的一些经典论述，对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作出独树一帜的解释。

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美国崛起过程中特定历史条件和发展特点的理解。在后来，一些学者在张友伦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接着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进行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探讨。直到今天，这个课题依然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而《美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农业革命》为后来的研究奠定的基础，成为后学教学和研究的必读书目和重要参考书。

#### （四）西部史

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张友伦先生在美国西部史、西进运动史的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内最早开始对西进运动和西部史研究的美国史学家之一；二、在概念上厘清了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关系与区别；三、打通了美国西进运动史与西部史的关联；四、是国内对美国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研究较全面、综合、系统的史学家之一；五、张先生的研究富有强烈的史学家责任感，服务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在张先生的西部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西进运动是美国拓展西部疆域和开发广阔的西部的过程，历时大约一个世纪。西部史研究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即便是美国西部史专家的巨著，也不能包罗万象。

张友伦先生在他的《孔见集》“自序”中说，美国西部史是他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课题。实际上，早在1979年，张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收录的论文“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一文中，就已论及西进运动、开发西部、开发西部交通，以及西部雄厚的农业基础在美国工业后来居上其中的作用等问题。同年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张先生在“美国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性和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较早提出了在对西进运动的评价上，除了土地扩张、屠杀印第安人的阴暗面外，还应看到西进运动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创业经历，直接推动了农业，而且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和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的积极作用。在1982年《世界历史》第2期“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中，张先生又以广阔的西部国有土地的存在和分配标志着“美国式”道路的开始，初步探讨了美国政府在西部土地立法对西进运动的作用。

与同期开展对美国西进运动研究的历史学者相比，张友伦先生的研究着重在对西进运动的评价问题上发表见解。在“评价美国西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通过对西进运动的主流、美国政府在西进运动中的作用、如何看待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以及西进

运动史学的演变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张先生肯定了西进运动的主流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发美国西部土地的过程，是美国历史发展上的战略性措施，对美国的发展曾经起过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政府的作用方面，张先生肯定了其重要性。首先，没有美国政府的参与，美国西部广阔的土地是不可能较短的时期内开发出来的，主要表现为西部广大自由土地的存在和美国政府处理西部土地的政策是西进运动的前提。第二，美国政府发展交通运输的政策吸引大量私人资本投入建设通往西部的交通体系，对西进运动的迅速开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开发西部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此文深化了他在“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中就已探讨的政府作用。在印第安人惨遭屠杀和驱赶的问题上，张先生提出美国西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发广大西部的群众性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但决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阴暗面而贬低甚至否定其重要作用。在当时思想解放刚刚起步阶段，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难度是非常大的，一是难在敢于对国内长期以来以揭露西进运动的阴暗面为主流的批判论调的反思，这需要极大的学术探讨的勇气；二是难在提出反思后的事实材料的支撑。当时的对外交流有限，研究工作刚刚恢复，图书资料极度缺乏，就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张先生查阅了当时所能查阅到的中英文资料，根据翔实的史料，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对所查阅到的这些史料加以科学分析研究，拨开历史的一个不全面的说法，客观地看待西进运动的本质。

在研究西部史的方法论上，张先生认为：美国的西部史学是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及其地位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因此撇开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据对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状况研究，张先生在概念上厘清了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关系与区别。他在一文中指出：“西进运动虽然是美国在 19 世纪所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它毕竟是一个已经终结了的历史过程。进入 20 世纪以后，尽管还有人不断移往西部，但其规模和作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失去了西部史研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时，西部广大地区建州的过程已经完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趋于成熟。西部本身和西部诸州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西部史的研究领域也随着扩大，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关心 20 世纪的西部地区史，并对特纳的学说进行检讨和批评。美国西部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时期。”

在《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二卷）中，作为分册主编的张先生针对过去主要揭露西进运动的阴暗面而对其所起的重要作用却一笔带过现象，以及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实际所起的作用，设置了独立的一章来谈这个问题。张先生对这一安排作出这样的解释：“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决定了此后美国的命运。所谓的西进运动就是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广大土地的开发过程，包括西部疆域的扩张，群众性的土地开发，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屠杀。如果没有西进运动，美国就不可能成为横跨美洲大陆的泱泱大国，不可能在 19 世纪末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另外，美国人在西进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危险，以及所采取的方法和克服过程，甚至他们的失误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单列一章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详细的全面论述。

张先生在对美国西部史研究的领域内有一个着力点是美国政府在西进运动和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在“关于美国 1787 年西北法令的评价问题”、“略论水利设施对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和“19 世纪美国西部开发中的三大核心问题”等文章中，张先生通过对美国西部土地、交通、水资源等核心问题的研究，考察了立法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中国西部开发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且为中国在不断完善和政府行政管理和如何有效的实行政干预变量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张友伦先生对美国政府从邦联时期制定的有关处理西部土地的法令予以了介绍，并对 1787 年西北法令出台的历史背景、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其后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认为，西北法令第一次在政治上确定了处理西部土地的原则，即西部新州“在一切方面均与原有诸州平等的地位上”加入邦联，消除了东部各州打算西进的居民惧怕丧失原有政治地位的顾虑，使西进移民受到极大鼓舞，也使西部地区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组建政府，从而扩大了联邦的版图，加强了联邦的实力。由此可推 1787 年法令不仅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到美国后来的富强。可见，在美国西部迅速开发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正确的政府政策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 2005 年出版的《美国西进运动探要》中，张先生打通了西进运动史与西部史的关联，构建起美国西部史的研究框架体系，并对美国西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用“独立前的西部”和“第一个世界性殖民浪潮的冲击和美国的土地扩张”两章的篇幅，在时间和空间上勾勒出美国西部地区地域概念的动态发展和最终形成，描述了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国际政治矛盾，并分析了作为土地扩张舆论准备的理论“天定命运说”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探要》还用了“美国西进运动史学的独特分支——印第安史学的兴起”、“西进中的印第安人问题”和“印第安战争”三章内容，探讨了印第安人在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命运。

张先生还在《探要》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西部城市发展史、妇女在开发西部过程中的作用、西部社会史、经济史、暴力史等都加以研究，拓宽了传统西部史的研究范围。对美国西部社会史的研究拓展在《探要》还表现为对拓荒者淘金人的生活、对西部的宗教和教育、文学和艺术以及没有政府的社会等社会现象、社会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这些内容所占篇幅不多，在书中的比重弱于其他篇章，但与其他内容一起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美国西部史研究框架，为后来者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予以了指引。

在这部著作的“后记”中，张先生犹感到意犹未尽，写到，“写完这部书以后我才进一步认识到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性。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我们的前辈很重视历史，喜欢以史为鉴。《战国策》中就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以后又辗转相传，几乎成了‘座右铭’。的确许多历史事件都是值得借鉴，应当借鉴的。美国西进运动尤其如此”；“因为西进运动不是一般的历史事件。它关系到美国日后的发展。运动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以及对待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都非常重要，对其他国家有借鉴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研究和对待西进运动留下的沉痛教训，并且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更多的失误。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很有好处的。”而事实是我们现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员仍旧非常少。

相对于张先生的学术造诣和事业成就，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呼吁更能突出他的学术道德品质。这在张先生的西部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曾说，西部开发，“美国人民做到了，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壮举。事隔 100 多年，我国也面临着大西部的开发问题。历史条件和两国的国情虽然大不相同，但所面对的问题却有很多共同之处。过去美国人跨出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总结。”

#### （五）通史

张友伦先生在美国通史的写作方面作了大量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主持编写《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二卷）。该卷本涵盖了 1775—1860 年从独立战争开始到内战前夕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重要，其中不少重大事件都可以写成专书。

对通史来说，首先要通。对张友伦先生来说，这“通”的取舍标准是：美国这一年轻的共和国在开国阶段问题成堆，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走上正确的轨道，并迎来了初步繁荣的过程中，哪些事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属于这类问题的有独立战争、联邦制的确立、两党政治的形成、工业革命、农业发展、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以及南北两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等。尽管政治史在第二卷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但是以政治史代替通史的倾向在该书中得到明显地纠正。经济、文化、民族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成为该书的醒目内容，文学艺术、学术、教育也占有了一定的篇幅。

其中，美国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各自独立成章。这是因为张友伦先生认为“工业革命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大机器生产的转变，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得到了巩固；同时它也使美国社会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从此构成美国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内容。”工业革命的全过程和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在书中得到了详细地描述。

在农业方面，19 世纪初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美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有许多东西值得研究和借鉴。该书对美国农业在大规模拓殖西部土地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并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美国农业在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提供的资金和农副产品的保障作用予以了较为详细地介绍与肯定。

从美国社会文化的角度考虑，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除去印第安人以外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习俗对美国的民族性格、社会风尚、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都有所影响。不了解移民就不可能读懂美国社会。为帮助读者了解美国社会，该书专设一章，对影响移民大批涌入美国的原因、移民的分布和就业以及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西进运动因其对美国历史的发展所起到的决定了此后美国的命运的作用，在该书中也以专章的篇幅给予了比较详细的全面论述。

简而言之，《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一书的编排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美国画卷，有利于读者客观全面了解美国社会的不同领域和侧面，避免用中国的社会文化去对照美国的社会文化，开阔读者的视野，减少认知误区。在修订版中，张友伦先生一如既往的保持了他在学术方面不断往精深进取的作风，根据新的认识又对美国宗教和土地问题加以论述。

译介工作是我们学习美国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张友伦先生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最有代表性的是参与《美利坚合众国成长史》的翻译和主持编写了《美国历史百科全书》。

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中国的加拿大通史的编纂也起了奠基的重要作用。90年代初，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资助下，张先生带领美国史研究室的青年教师们一起撰写了一本《加拿大通史简编》。这部著作至今仍旧是国内学术品质上乘的加拿大通史。在此基础上，1995年这本通史的主编之一原祖杰为南开大学历史所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加拿大史”课程。如今，这门课程已经发展成为面对历史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全校本科生、分校本科生等至少五种选修课程。南开大学也成为中国加拿大研究的重镇之一（2004-2006年为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地），是中国最先设立培养加拿大史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单位，由此形成南开独具的北美史的研究阵容。

#### （六）社会史

社会史的概念非常广泛，实际上，张友伦先生发表的一系列涉及美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大都冠以社会制度的研究，大体集中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问题和作用等方面。基于历史考察，张先生肯定了“美国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民主制度比较完备而又颇具特色的国家。”同时指出美国社会制度“从形成伊始就存在许多问题”。

1994年张友伦先生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化的开端”一文中指出，“现代化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封建社会，而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出现”；“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开始。”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宪法的通过、联邦政府的成立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的标志。张先生认为这也是美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并且通过美国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说明了：“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开端要略晚于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化学习的过程中，这篇文章无论是在现代化的过程研究，还是在现代化的层面研究、领域研究都是有着积极开拓作用的。

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方面，张友伦先生纵横比较了欧美历史社会背景，指出英国移民带到北美殖民地的反对宗教迫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观念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巩固；在客观条件上，北美殖民地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封建势力的直接干预；这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保障。在问题方面，由于南部殖民地种植园中奴隶劳动的使用、为发展殖民地而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以及从欧洲带来的轻视妇女的思想，使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两大缺陷。如何在发展中纠正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张友伦先生指出：“在美国的历史经验中还找不到政府决策人主动纠正民主制度缺陷的例证。许多重要法令的出台都是不同程度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完成的。而某些带有普遍性的和根本性的法令甚至需要规模巨大、形式激烈的社会运动的推动才可能颁布。”于是，张友伦先生总结道“社会运动是纠正美国民主制度缺陷的动力”。

张友伦先生在1999年出版了新作《美国社会的悖论》，在第一编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和问题中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与问题的由来是同步的；“美国在奠定民主制度过程中，与欧洲国家遇到的阻力不同，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不同”；“美国民主化的阻力主要来自宗主国，因此它采取了独立战争的形式来摆脱英国的控制。美国人民在取得革命

战争胜利以后创建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通过了宪法，确立了民主制度”，并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

这本著作举例印第安人的问题主要通过联邦政府印第安政策的转变而得到解决的。联邦政府政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社会的进步力量的推动。张友伦先生在肯定这一社会进步力量的同时，深刻地指出：“真正推动美国联邦政府改变印第安政策的力量是隔离政策本身所采取的保留地制度已不符合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美国社会的悖论》揭示了美国历史上存在的违背自由、平等、民主原则的事实，力图说明美国民主制度同美国的历史背景和美国国情之间的联系和所受到的影响；说明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和缺陷以及由此形成的两大难题；说明解决这两大难题的过程和推动力以及存在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解决社会难题的过程中，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得到了发展。此外，张友伦先生还论述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化开端的关系。

### 三、学术风格

回顾张友伦先生走过的史学研究之路，我们可以发现他特有的稳健、中庸，不走极端、不慕时尚的学术风格。他的学术思想、对学生的培养方法和对历史研究的理解质朴而独到。

张友伦先生认为，对于搞世界史的人来说，国学基础非常重要。他说，“要求每一位世界史工作者都通晓国学自然是过于苛刻了，但多学一点国学知识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首先孔孟和诸子百家留下的思想财富十分宝贵、十分丰富。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各有千秋，高度概括地集中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思想、需求和崇尚，其洞察力和深度绝不输于西方的古代思想家”；“如果只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家而不了解孔、孟、老、庄，就是知识上的一大缺陷。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其次国学中的史学书籍同我们学历史的人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史和中国史虽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理论、方法和研究目的却是相通”。张先生的这些治史思想和文章修养都体现在其学术成果的字里行间。张先生文如其人，却将其文集谦虚地命名为《孔见集》，取《盐铁论》“通一孔，晓一理”之意。而我们从其所著中，总能领略到先生自谦的“一孔之见”其实至深至远。

此外，张先生对于年轻学者的培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与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朝夕相处，多少知道一些他们的追求和难处”；“厚积薄发是大家都承认的治学态度。但青年教师积累不多，发表几篇文章是不是就触犯了这个原则？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世界历史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即使只选择某个断代做为研究方向，那也很难做到厚积。而且厚积又没有共同的尺度，也许十几年过去也没有达到发表文章的标准。青年教师等不起。如果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以具体题目为突破点，范围小了，厚积的难度就会小许多。发一点东西也就指日可待了”；“另外，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都是对观察问题、把握问题能力、逻辑思维、写作技巧、文字水平的全面检验和锻炼，有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定要求青年教师一写惊人，那就是强人所难了。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即使积累厚了也不见得能发出什么东西”；“可见发的过程也是拓宽和加深积的过



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张先生向学生反复告诫动笔写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知难而进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尽可能给他们创造发表文章的机会。显然，这种指导程序令众弟子受益非浅。他曾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多种课程，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近 30 名，其中有的到国外深造，有的已成为国内学界的学术骨干。

对于目前对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量化的问题，张先生认为，“量化也许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管理方法，但绝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得不当很容易引发弄虚作假的歪风。激发和引导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张先生一生遇到无数困难坎坷，但正如他所言，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他的史学位置夹在两代学人中间，在老一代之下，在新一代之上。专业的转向、政治的动荡和改革开放的冲击，这些情况在所有新老学者身上都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对他这一代而言，则是全面经受。他曾经很多难处，但是他谦和忍让，宽容大度，识大局顾大体，避免了不必要的内损。在 1986—1996 年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期间，他为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赢得了广大同行的尊敬和赞誉。他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1986—1990）和美国史研究室主任（80 年代）期间，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学术远见，稳定研究队伍、弥补缺失人才，传递薪火，在有限的范围内苦心经营。在研究条件相对艰难的改革开放初期，他多渠道争取研究经费，尽可能多地为年轻学者提供出版、发表成果的机会。在许多关乎学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决策果断，公心唯上，勇于担当，使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成为国内研究的重镇之一。他对年轻教师提携有方，或慧眼识珍，或指点迷津，保留了南开美国史研究队伍二十多年在国内的研究实力。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今天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能有如此的规模，张先生功勋卓著。

在此，以他的学生对他的描述结束全文，“怀忠恕之心，威严之中含爱意；持中庸之道，平凡之处见高深”。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致张友伦教授贺信

尊敬的张友伦先生：

适逢先生八十华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向您表示由衷的祝贺！

张先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在美国工人运动史、美国农业史、西部开发史、民主政治史和种族关系史等领域建树卓著，硕果累累。张先生教书育人，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张先生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达十年之久，为本会的成长壮大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得广大会员的尊敬和爱戴。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11 年 5 月 9 日

# 致张友伦先生的贺信

王 旭

尊敬的张友伦先生：

您好！在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我谨向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愿先生健康快乐，幸福长寿！

先生学术成就斐然，尤其在美国史方面著述甚丰，备受推崇，在美国社会经济史、种族关系史、工人运动史、西进运动史和美国史学史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多有建树，其中很多著述是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在步入美国史研究学术殿堂时的启蒙读本。先生对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贡献更是有口皆碑。先生担任我会领导工作多年，并于 1986 至 1996 年间出任理事长。其间美国史研究队伍新老更替、研究领域迅速拓展、研究方法推陈出新，是充满变数的调整发展期。先生高擎大旗，沉稳运筹，承前启后，全国美国史同仁戮力同心，推动美国史研究会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终于成就今日之繁荣局面。我们每每重温这段历史，都能汲取到无穷的精神力量。先生在南开的历史学科建设及美国史研究平台建设上，也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在鼎力辅佐杨生茂先生的同时，言传身教，奖掖后学，带出李剑鸣等一批优秀弟子，在美国史研究会担当重任，在国内学术界熠熠生辉。藉此，美国史研究的南开群体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与研究会携手共进，成为我会发展史上一段佳话。

因时间关系，我无法参加南开弟子们发起的为先生祝寿活动。日前曾借去天津师大开会的机会去看望先生，权当提前给先生拜寿。见先生银发皓齿，谈笑一如既往；儒雅淡定，风度不减当年，而且，每天仍骑自行车穿梭在校园和闹市，与年轻人无异，心中甚感宽慰，当然更加钦佩。此次借韩宇专程参加祝寿活动的机会，再次表达我对您的深深祝福！

王 旭

2011 年 6 月 8 日遥祝于厦门大学

# 祝贺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

黄安年

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庆贺会并请转张友伦先生：

欣闻张门弟子将于5月8日，提前一年为张友伦先生举行八十华诞庆贺会，值此张先生提前跨入“80后”学术老人行列之机，请接受您的挚友、我的由衷祝贺，祝愿您健康长寿、诸事顺遂。

张先生是我国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的著名学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卓有成效的组织者之一，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重镇南开美国中心的承前启后的掌门人。

张先生的美国近代史、西进运动史、社会运动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对我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些反映在《美国西进运动探要》、《美国农业革命》、《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美国工人运动史》、《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阶级》、《美国历史词典》、《孔见集》等著作和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中。张先生在教学和研究中所培养和影响的众多弟子深受先生的恩泽，他们中的多数学人已经成为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中坚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张友伦先生积极参与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初创工作，自1982-1986年起协助刘绪贻先生组织研究会日常工作，1986-1996年间，张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1996年至今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顾问，他还是中华美国学会的常务会议理事和中华美国学会出版补贴基金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委员，对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他成功地组织了1990年的开封郑州会议、1993年的威海国际学术会议、1996年的长春国际学术会议，显示了他卓有成效的组织能力。30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发展无不倾注了张先生的汗水、辛劳、智慧，他的稳重应对、宽厚容忍、亲和待人、坚持原则、灵活多样、勤俭节约、奉公守纪、不懈努力的精神，赢得了广大同行的尊敬和赞誉。我有幸自1979年和先生结识，1986-1996年间协助张先生开展理事会工作，深得先生的支持、体贴、关爱和帮助，尤其是1990-1996年间，理事长、秘书长、常务理事京津地区频繁召开会议，先生每次自天津赶来北京，早出晚归、风尘仆仆、自掏路费、盒饭共餐，勤俭办会、民主讨论，这段历史记忆迄今难忘。去年的今天（5月8日），我蒙南开盛邀讲学，先生出席作陪，令我十分感动。我还要感谢先生在1996年4月对我的《当代美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历史考察》课题结项报告进行评审，并在1997年对我的《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60余万字书稿进行仔细审读，该书的出版也凝聚了张先生的心血。

张友伦先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美国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南开美国史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南开美国史团队建设和美国史研究成果同样无不倾注了先生的毕生奉献，在南开美国中心的发展进程中，张先生承前启后的掌门人作用是其他学者无法替代的，张先生为推进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事业，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将为南开后学们所铭记和弘扬。

由杨生茂先生创办，张先生辅佐的南开美国史研究基地已经走过了 46 年，南开作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排头兵之一，有着重视人才国际合作与交流、鼓励人才有序流动、精心培养和积极引进学术带头人、着力发挥学术团队优势、坚持和弘扬前辈学术思想和精神等优秀特征。现在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人才竞争也愈演愈烈，学术带头人不断更迭，杨生茂先生所开创、张友伦先生所继承、李剑鸣先生曾接力的南开美国史研究，相信现在的学术带头人和南开学术团队，只要在新的条件下，与时俱进，振奋精神，协力合作，坚持和发扬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一定会开辟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您的挚友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黄安年

2010 年 4 月 26 日于北京天通苑

## 致张友伦先生贺信

梁茂信

欣闻南开大学张友伦教授喜逢 80 寿辰，我谨代表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全体师生表示诚挚的祝贺，祝愿先生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精神矍铄，晚年幸福。多年来，先生潜心治学，奖掖后人，道德文章，载誉华夏，堪称后生之楷模。先生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对推动各地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学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作为 80 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学者，在过去 20 多年间，与先生多次交往，受益匪浅，倍感荣幸，视先生为“启蒙”导师，藉此祝寿之机，特表谢意。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梁茂信

201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

# 悠悠寸心谢师恩

## ——敬贺业师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

李剑鸣

将近三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分到湘中北一所师专教书。学校座落在远离市区的山里，校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商店，除了卖一些生活用品，还代销图书。一天，我到商店里买东西，无意中看到一本书，标题是《美国农业革命》，不觉喜出望外，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回到简陋的单身宿舍，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作者的见解和文笔，都给了我极深、极好的印象，心想，如果要学美国史，就要做这样的学问，写这样的书。

当时，我正好对美国史产生了兴趣，想考研究生。于是，我就给这本书的作者张友伦先生写信，也得到了他的简短的回信，表示欢迎我报考。不久，有个同事从外地参加美国史年会回来，说在会上见到了张先生，还给我描绘了他的相貌和风度。于是，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一定要报考南开的研究生，投到张先生门下学习美国史。我那时何曾想到，这个小小的决心，后来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给了我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和生活。

不久，我调到湘潭大学工作，教学之余，全力复习备考。1986年，我幸运地考取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不过，由于校方只允许报考在职委培研究生，我尽管考分不错，但也只能跟学校签了一个委培协议，领着工资去上学，三年后回湘大工作。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要能到南开学美国史，就“于愿足矣”。

到了南开，在历史研究所的开学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张先生。那时，他刚五十五岁，头发雪白，面色红润，待人亲切平易。我请他做我的导师，他当即满口答应。不久，张先生担任了历史研究所所长，工作繁忙，一直没有给研究生开课。不过，他请了好几位美国学者给我们授课，有时还亲自主持美国学者的讲座。我从未听过张先生的课，固然是一大遗憾，但私下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却远非听课所能比拟。

我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学问的深浅，一味地乱写文章，写了就请张先生批改。他看过后，只在稿纸边上加一些批语，当面并不给我多说。他看过的稿子，有的在刊物登出来了，有的收入了他主编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投到《历史研究》的文章，修改过几次，二审仍未通过。责任编辑让我找张先生想想办法。张先生看过稿子和编辑部的意见，觉得再改也没有什么意义，就建议我放到《南开史学》发表了。

通过这些文章，张先生大约看出我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希望我在学业上有更好的发展，便动员我考杨生茂教授的博士生，而且是提前一年考。这对我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我念的是在职委培，要报考博士生，必须征得原单位的同意，其难度可能很大。杨先生在跟我谈话时明确表示，如果跟他念博士，只能做史学史或外交史，而我却对政治史更有兴趣，这也让我颇费踌躇。再则，与妻儿长久分离，早有难以忍受之感，一心只想早点毕业回家。寒假里，我与家人商量这事，他（她）们都表示尊重我的意愿。开学后，我一到南开就去看望张先生。他见面就问：“我最关心的是你能不能考博士？”我摇

摇头，做了否定的表示。我没敢看他的脸色，不知他是不是有些失望。

转眼到了毕业之际。一天，张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跟我谈了留校的事。他说，所里决定留我，并已请示学校，从校长基金拿出一笔钱，退还我的委培费和在学期间领的工资。张先生让我先跟家里商量，并问湘大是否愿意放人。我一时十分犯难，不知如何作答。在此之前，我已为回湘大工作做了精心安排。那时，湘大历史系因学生分配困难，已经停招一年，今后这个系还能否存在下去，大家心里都没有把握，我也很是彷徨。于是，我便找熟人疏通，准备毕业后转到湘大法律系，从事英美法的教学。这时，张先生突然提出要我留在南开，跟我一直以来的想法颇不一样。我给家里和朋友写信商量，他（她）们都支持我留在天津。经过一番周折，湘大终于同意放人，南开也按约偿付了我的代培费和工资，共计两万两千元。据说，南开以这种方式留一个硕士生，并没有先例，后来也没有听说有第二例。张先生做成这件事，肯定费了很大的心力，听说所里对他的做法也有些议论。我当时也隐约感到一些压力，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决不能让张先生为难。

刚办完留校手续，张先生就开始为我张罗家属的调动，并托人为我寻找住房。同时，他更是为我创造一切条件，提供各种机会，以利于我在学术上尽快成长。他带着我参加一些他主持的项目，如编写《美国历史词典》，写作《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此外，我自己也在动手写《大转折的年代》一书。当时，学术著作出版难已是一个普遍问题，我作为一个无名小卒，要独立出一本专业书，不免有“蜀道”之叹。其实，我的困难早在张先生的考虑之中。正巧有一笔出版基金可供申请，但我的书稿尚未成形，赶不上申请的截止日期。张先生手头有一部书稿，出版社已答应出版。他便想了一个变通办法：拿这部书稿去申请一笔资助，并与出版社谈妥，申请来的经费用于出我的书。为了办好这件事，张先生带着我去出版社，找负责人和编辑面谈，并把我列为他的书稿的第二主编，以便于申请。事情顺利地办成了，我的第一本书很快就出版了。按照当时的风气，一般是学生的作品由导师挂名；因此，当我作为第二主编的那本书出版后，常有人问我，是不是我做的工作，张先生只是挂名。我说，恰恰相反，所有工作都是张先生做的，而我只是挂名。

对我的职称问题，张先生一直十分关心。我想，他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美国史研究室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需要补充有高级职称的人员，以建设一个相对合理的学术梯队；另一方面，我当时生活极为困难，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如果评上了副教授，就可以向学校要住房，能有较为舒适的生活条件。1990年冬天，南开大学首次实行破格晋升制度。张先生和师资处交涉，并动员我申报破格副教授。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时难以置信。我并不理解张先生的苦心，觉得自己的学术水平离副教授的标准相去甚远，根本不抱评上的奢望，述职汇报也做得敷衍潦草。果然是名落孙山。不久，张先生赴美国做研究，有一整年不在学校。我自觉学业上略有长进，再次申报了破格晋升副教授。原以为这次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中途却出了一个很大的意外。有一封匿名信对我提出指控，称我在研究生期间发表的一篇习作有思想倾向的问题。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形势下，这样的指控是极具“杀伤力”的。校方对这封匿名信高度重视，并在校职称评聘会上公布，结果我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张先生回国后，了解到这一情

况，对学校有关方面做了解释和说明，力图澄清我的问题。到了再次评职称时，他又做了细致周到的工作，避免有人继续揪我的“小辫子”。最终是有惊无险，好歹评上了副教授，张先生心里的石头也算落了地。

接下来，张先生便开始操心我的出国问题。我依稀记得，当时有关部门做了规定，年轻教师不满三十五岁不能出国。在我快达到这个年龄要求时，张先生就着手为我出国做铺垫工作。他跟学校师资处和外事处谈了我的情况，又利用参加富布赖特学者选拔面试的机会，向美国使馆有关官员大力推荐我。这些事我原本毫不知情，等我到使馆办手续时，负责此事的美方文化官员对我说：“我们可是早就知道你，张教授多次推荐过你。”在我准备申报富布赖特项目的材料时，张先生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还为我写了推荐信。那年，张先生仍是面试小组的成员。在我面试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我见他坐在那里，心里便格外踏实，面试也顺利过关。

在我出国期间，学校向张先生提出了退休的问题。他表示，自己已过了退休年龄，退是理所当然的，但美国史的师资不能削弱，希望学校考虑李剑鸣的博导资格。在他的要求下，学校同意我参加当年增列博导的评审。我当时身在国外，对这件事全然不知。张先生悄悄代我填写了繁琐的表格，并且亲自到评审会上替我述职。据在场的人事后说，他们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认认真真地替学生做这样的事，不免十分感动。这可能给我争得了一些“同情分”，增列博导的事便顺利通过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教育部启动了首届“跨世纪人才”评审工作，历史研究所推荐我申报。可是，我人在国外，不能填表和提供材料。张先生再次代我完成了这一工作。可惜，这次让张先生的心血付诸东流，我没有评上。2000年我再次参加“跨世纪人才”评审。这次是我自己填表和准备材料。表格之复杂琐细，材料之具体繁多，几乎让我半路放弃。我不由想起，几年前张先生替我填表和准备材料，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耽误了多少时间，一时真是感慨系之，叹息良久。

张先生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可是我当时却一无所知。我在美国期间，张先生给我写过信，似乎只字未提为我申报博导和“跨世纪人才”的事。我回国以后，才从同事那里得悉实情，内心的感动自是无法言表的。2001年，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给张先生庆祝七十大寿。时任历史学院院长的李治安教授表示，他一定要出席祝寿会，向张先生表达祝贺和敬意。他对我说：“我一直记得那年评博导时张先生为你汇报的情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学者，站在那里替自己学生述职，这一幕实在感人！就冲这一点，我也要当面向张先生致敬。他不光是为你个人，这是从学科发展着想啊！”听了他的话，我深受触动，内心似有千言万语，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另外，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在张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达二十年之久，可是从来没有听到他表扬我。我想，张先生为人严谨克制，对学生要求严格，不轻易称赞人，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张先生的熟人见了我就说：“你还不知道吧，张先生经常夸你，总是说你如何出色呢！”有个朋友还对我说：“你还在读研究生时，张先生就老是在所里夸你，说你如何优秀，说得我们都有些忌妒，心想，这李剑鸣是个什么人物，连张先生这样轻易不夸奖人的人，也赞不绝口！”

这些年来，张先生一直教我治学和做人，为我创造条件，铺平道路，做了那么多琐

碎繁难的事，使我在学业上和生活上一帆风顺。可是，我却几乎没有为他做过什么。我没有给他抄过一页稿子，没有给他换过一回煤气，没有给他送过一件像样的礼物，甚至也很少说过感激的话。

现在，我已步入中年，不免添了一些暮气，总喜欢回忆过去。我想，如果在求学路上没有遇到张先生，如果没有张先生的关怀和提携，我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严肃的历史研究不主张做轻率的假设，所谓“反事实推理”也有很多严格的条件限制。可是，我还是禁不住想，如果不是张先生，尽管我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学术工作者，也会在某一所高校教书，但我绝对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好的状态，也不会从专业工作中获得这样多的乐趣。

旧时文人称颂自己老师，常有“恩同再造”的说法。我过去曾想，这当中多少包含着夸张和客套的成分。可是，每当念及张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教诲和扶持，我觉得除了这四个字，似乎没有更好的文辞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戴。

在这天气和暖、万物争荣的五月，借着庆贺张先生八十华诞的机会，我终于能把在心里积累多年的谢意，痛痛快快地向他表达出来。

2011年5月16日

## 祝贺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

徐国琦

张先生是我的老师兼同事。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是1984年春。当时我报考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的研究生，到南开复试。杨生茂先生、冯承柏先生及张友伦先生为复试时的三位主考。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未知权威为何物，对三位主考提问时的回答激情有加，但难免不够谦恭。记得当时为何谓边疆及民族主义的问题甚至同冯承柏先生辩论起来。不过三位先生似乎毫不为忤，反有“孺子可教”的赞许神色。张先生当时鼓励的目光至今想起来仍然十分亲切。自此以后我有幸成为南开人，并在张先生领导的美国史研究室度过了六个忙碌而愉快的年头。自我1984年进入南开到1990年底负笈美国的6年间，是南开美国史研究发展的黄金年份。张先生时任历史研究所所长（1986-2000）及美国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名家荟萃，除了杨先生外，还有周基堃先生，易廷镇先生，冯承柏先生，陆镜生先生，李青先生等。在张先生的领导下，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成果丰硕，取得了令全国学界瞩目的地位。

张先生的领导风格是“温良恭俭让”，“无为而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研究特长及积极性。我在南开期间，张先生从未干涉过我的研究及工作，对我从来都是鼓励有加，全力支持。约在1988年中华美国学会设立首届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出版基金，张先生不仅鼓励我申请，并在众多不乏中老年专家学者的申请者中，对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



轻后生小子大力支持，我最终能在众多申请者中获得唯一的最高资助，肯定是和张先生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后来很快出国深造，所作的研究课题同我当初的选题有所不同，打算放弃出版基金。张先生并未严词反对，正相反，对我的决定表示理解。张先生对后辈的关爱理解和宽宏大量的胸襟由此可见一斑。

张先生作为领导的另一个特点是求贤若渴，大力引进人才。我当时作为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年轻教师，经张先生委托亲身参与两起引进人才的具体操作。其一是调动王玮。王玮当时在河北某大学任教，我在杨生茂，张友伦先生的指导下，奉命到河北办理调动事宜。遗憾的是当时王玮所在学校领导坚决不同意放人，使我最终无功而返。其二是“收买”李剑鸣。李剑鸣当时系南开为外省所代培硕士研究生，张先生慧眼识才，决定李剑鸣毕业后不放他回原地。我奉命办理代南开“购买”李剑鸣事宜，顺利成功。（南开当时似以四、五万元“买下”李剑鸣。假如李剑鸣乃“股票”，我即持有原始股的股民之一，现今大发矣！）王玮，李剑鸣都是目前中国美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张先生的伯乐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值此庆贺张先生 80 华诞之际，草成此篇，一为表示对张先生的崇高敬意及感谢，二为分享他人不尽知的有关张先生美德的学界典故，以此作为贺诞花瓣一束，倘能博张先生笑纳，吾愿足矣。有关张先生的学术贡献，有先生的高足如李剑鸣，杨令侠，原祖杰等已在另处分述，我这里就不再班门弄斧了。

在此遥祝张先生身体健康，寿比南山！请张先生的津门弟子存好一瓶烈酒，他日有机会再访津门，定当到张先生府上同张先生痛饮三杯，为张先生的高风亮节及学术文章，一醉方休！

2011 年春日于香江

# 点滴师恩 一生难忘

## ——敬贺业师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

陈奕平

我喜欢上美国史是在上大学后不久。近 30 年前，高考填报志愿时，我一心想学经济，却被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学）的历史系录取，心情颇为低落。在积极争取转外语系未果后，我下定决心通过考研来改变“命运”。在当时“美国热”的情形之下，我决定报考美国史研究生。

当时，凡是书店有美国史的书，都尽量购买。在阅读各种书籍中，有两本新出版的书引起了我的兴趣，就是张友伦先生写的《美国农业革命》和《美国工业革命》，因为我认为这与读高中时想报考的经济类专业有些接近，也因为我从农村来，关注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问题。后来，不但我的本科论文探讨美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也下定决心报考南开大学张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通过南开的朋友了解情况后，尝试给张先生写信，没想到张先生很快回信，表示欢迎我报考。经过激烈的竞争，1987 年我有幸成为南开大学地区国别史（美国史方向）8 位研究生之一。

在南开三年，是我学术生涯正式起步的三年，也是与张先生、陆镜生先生和已故的杨生茂先生、周基堃先生等结下师恩情谊的时期。由于大学期间的兴趣，我选择张先生做我的导师，他很爽快地答应。跟张先生三年，其点滴师恩，至今历历在目，特辑录如下：

一是，鼓励多读书，多做笔记。刚进南开时，张先生任南开历史研究所所长，记得所里规定，给每位研究生发 2 盒卡片，让研究生尽量做资料摘要。读书期间，在张先生的引导下，我常常去美国史研究室资料室、南开大学图书馆甚至北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做摘要和笔记。在当时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情况下，搞研究全靠读书摘要和笔记。这些笔记和摘要成为我当时进行学术研究和撰写毕业论文的重要基础。这两盒卡片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书柜中。

二是，带着我们参加课题研究。我记得刚进南开不久，张先生就让我们参加《美国历史词典》的编写（后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以《美国历史百科辞典》之名出版）。通过词典的编写，查阅各种资料，及与张先生的交流，我们从中受益匪浅。后来，张先生承担了《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项目，也让我参加，并让我负责撰写美国废奴运动部分。期间，张先生不但给予指导、鼓励，也让我尽可能多地查找相关英文资料。可以说，参加这些项目使我慢慢懂得了如何进行学术研究。

三是，鼓励向高水平杂志投稿。刚到南开不久，我就将本科毕业论文修改成文——《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关系》，并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后来，又将硕士论文《美国人口的城市化与郊区化》初稿的一部分，以《美国城市人口的郊区化》为题名，投给天津一份城市史方面的杂志发表了。张先生知道后，告诉我不要太急于发表文章，建议将论文另外一部分修改成文，投给北京的《美国研究》杂志。随后，

我将论文的前半部分修改成文——《农业人口外迁与美国人口城市化》。在张先生的推荐下，该文在《美国研究》上发表，并得了广东省青年社科二等奖。

四是，展现慈父心肠。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真正体会“师生如父子”这句话的涵义，是在大学任教并带学生之后。张先生言谈不多，为人严谨克制，对学生要求严格，往往给人以难以接近的感觉。但我多次与张先生交往后，发现他不但平易近人，而且时时替我们这些弟子着想。有几件事情可以说明这点。

一件事是张先生请我们吃饭。现在毕业时多是学生请老师吃饭。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张先生却主动提出请我们八位吃涮羊肉，这让我一直铭记在心。我到广州暨南大学带研究生后，也多年坚持请毕业的研究生吃饭，并述说当年张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情景。

另一件事，张先生对我战胜病魔的鼓励也让我难忘。我来广州没几年，到处奔波，患上恶性淋巴瘤，情绪跌到人生的低谷。在治疗期间，杨先生、张先生也多次来信鼓励，让我感动。

另外，在我的记忆中，张先生也不愿意“麻烦”学生。张先生带了不少学生，弟子分布各地，弟子们也多次想邀请张先生旅游讲学，但都被他拒绝。

一直以来，未能梳理在南开的记忆，对先生多年的教诲、关心和帮助致以感谢。值此庆贺张先生八十华诞的机会，细数先生点滴师恩，以表达由衷的谢意！

2011年6月7日

## 南开从师记 ——为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高春常

今年适逢德高望重的美国史专家张友伦先生 80 华诞，实在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承蒙先生厚爱，16年前我荣幸地皈依张先生门下，成为先生的开门博士弟子；此后的三年，得以徜徉在神圣的南开学术殿堂里。每想至此，记忆之河就奔流而下，一片片景象从模糊渐渐变得清晰……

坦白地说，我这人总爱沉浸在空想里，本来对学历史没有什么兴趣，考大学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第二志愿是文学，都是些跟“空想社会主义”挂钩的东东。但命运捉弄，不仅属意的大学没有进成，还稀里糊涂地进了历史系。没办法，没感情只得培养感情吧。好在那时山师大美国史研究阵容强大，刘祚昌先生领军，还有他的三、四位弟子坐镇，而哪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叱咤风云、势如中天？看来我须搭个便车，学美国史算了！

主意定了以后，我就琢磨报考哪个学校，曾经闪现过到南开大学念研究生的念头，

想到了如雷贯耳的杨生茂和张友伦等先生。现在看来，这时候出现了结缘南开的端倪——但实际证明还远得很，呵呵。我那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很顽强，听说现代化研究很时髦，那我就凑个热闹，干脆报考中国最厉害的学府——北京大学吧。

一定不出大家所料，我的“空想社会主义”再次碰壁了。剧情好像有些复杂，总之我的报考材料被转到河北师院历史系。开始还有些不太情愿；不过在那里，结缘南开的种子已经真正地种下了。

首先是杨先生的高足王玮教授在这里执教，成为我的老师，三年中他不仅对我的学业影响很大，后来也对我报考张友伦先生的决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其次是业师张兹署教授，在1988年10月石家庄举行的华北地区世界史研讨会上，他引介我和刘国柱师兄一起拜见了张友伦先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慈祥，但很有威严。只记得说了些问安之类的话，也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真正安心于学问。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好热闹哦。

1990年，河南大学主办美国史研讨会。记得在会上再次见识了时任理事长的张先生的风采，但没有机会求教。不过，河南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在参观环节，与来自南开的李剑鸣老师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交谈，尽管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聆听。南开之缘的种子开始有些滋润了。

但命运注定还要等待一段时间。那时候黄土文明一度受到舆论轰炸，我也有心向往蔚蓝色。我自以为到了海边就可离它近一些，因而在毕业后执意到了我现在的大学。

最初的几年，一言以蔽之，我是“痛并快乐着”。一方面开始安营扎寨，但真正的问题是，事业发展遇到了困惑。一连串的问题出来了：我应该到哪里去？我真正属于这里吗？

当伏藏的种子发出无奈的呼唤时，这时候幸好来了一阵及时雨。1994年王玮教授栖居烟台，有一天向我提供了张友伦先生将首招博士生的消息，并鼓励我抓住这个机会。这个消息让我喜出望外：噢，我早先没有报考博士，原来不仅是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因为张先生尚没有安排好，直到现在一切才准备就绪！

考试那天，除英语有些难度外，其他答卷感觉比较顺利。但心里没底，匆匆打道回府。

但不久传来佳音：通过。耶，南开！我可以到南开读书啦！

我的幸运之旅开始了。

## 二

的确，三年的南开生活是幸福的。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忙碌但充实。

报到不久，吴金平师兄来访。跟我相比，他是个“老南开”，因而成了我的南开生活向导。拜访张先生在内的南开诸位前辈，就是他带的路。

记得拜见张先生的那一天，与金平兄来到北村的住宅楼。师生见面，相谈甚欢，涉及我的答卷情况、南开的学术前辈情况，但更多的是如何做学问的问题。

对，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做学问！但我该从哪里下手啊？

为了理清思路，我针对张先生的研究领域看了一些材料。哇塞，真是叹为观止啊：西进运动、工人运动、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社会变革，都是美国史领域的一些重大课

题。我是否非得从中选择一个方向呢？

先生答曰：不必。

在论文选题问题上，张先生只否定了我的一个选项，意思是不能再对硕士论文“狗尾续貂”了，理由很充分：在这个领域你不可能超过李剑鸣老师。但他同时提出了许多可能性，如美国革命、美国外交、社会思潮、著名人物，等等，还有黑人问题，都可以。

黑人问题？我一听到黑人这个词，那是“相当地”不以为然，私下嘀咕，我们中国又没有黑人，这八竿子打不着的种族，研究这个有什么用？

但我从来没想到，黑人史竟然成为我此后研究的主要领域。

我当时说，我要把自己对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兴趣往前推一推，对重建问题进行梳理，可否？

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显然，张先生希望我尽快找到一个切入点。

随后我在这个领域查阅了大量外文文献，记笔记，思考问题，与友人切磋。有段时间我感到思路差不多了，就再次请教张先生。但在听了我的设想后，张先生给我泼了一瓢冷水：“平铺直叙是不行的，必须有创新性的东西。”

麻烦。还是得老老实实在地挖掘问题。我整日地泡在图书馆，希望能发现隧道尽头的光亮。有一天，灵感突然来了：既然重建时期面临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国家统一问题，而这是国家领导人考虑的问题，“肉食者谋之”；二是黑人问题，我可否从黑人问题切入，论述南方重建？

我亟不可待地请见张先生，而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很幸运，这次先生点头了；“不幸”的是，我从此以后卷入了黑人问题的漩涡——这个我最初回避的东西。

等到论文开题审核的时候，南开的诸位名师来到资料室，包括杨生茂先生、陆镜生先生、李剑鸣先生等人。他们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从头到尾我是忙于招架。但这次开题会对我的教益很大，尤其是陆镜生先生的问题相当犀利，对此我总是心存感激。

方向明确了以后，剩下的就是材料选择和梳理问题了，也不断出现一些次要的问题。比如原始资料的重要性问题，张先生的态度对此仍是十分肯定的，但认为我应首先把二手资料摸查得差不多。因那时没有个人电脑，写作手段比较原始，仅这些二手资料就把在读时间耗费得差不多了。由于当时的答辩成员刘祚昌先生要到美国（后来又推迟了），完稿时间还不得不提前了数月。因此，瑕疵是难免的。

期间每当我完成一章文稿，就把它交给张先生审阅。张先生看得甚是仔细，前前后后都有批语写在稿纸的两边。当文稿全部完成时，堆起来竟然有那么厚厚的一摞。但张先生从没有对文稿说过“满意”二字，只是表示我的结论部分“还可以”。

打印之后，按照张先生的指点，论文分别送给王玮教授、王旭教授、苏格教授、张宏毅教授和黄安年教授审阅。所有的细节，张先生都再三叮咛。

最后是论文答辩。当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的是外交学院的王德仁先生，刘祚昌先生也专程从济南赶来，杨生茂先生、陆镜生先生、李剑鸣先生也都来了。在南开主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答辩会开场了。也许是阵势大，具体怎么答的问题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人很多，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最终的结果是：通过！其实答辩过程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事后王德仁先生曾

告诫我，要警惕所存在的“唯心主义”倾向——也就是我固有的“空想社会主义”余毒。当然，张先生原来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安稳下来。

### 三

论文通过了，毕业典礼参加过了。按说张先生的职责也圆满完成了，但先生对我的关怀却越日甚一日。

1997年毕业之际，我对何去何从也没有什么规划；只感到有些疲惫，需要暂时休整一下。张先生探听我的口气，看我是否有留校的打算。鉴于我非自由之身，拖家带口不说，还背负着单位的契约，不回去是吃不消的。还有，我的外语听说能力是半吊子，在这知名高等学府里立足，怕有些捉襟见肘。因此我也不好说什么，还是乖乖地回去吧。

于是我又回到了烟台这个滨海小城。但与南开之缘还是“藕断丝连”，不时回去看望自己的恩师，而张先生也很关注着我的学术进展。

大概是在毕业一两年后，张先生告知，美国福特基金会有个出版资助项目，希望我能参与竞标。这真是个好事儿，我马不停蹄，很快就写好了申请材料。运气居然出奇的好，评审委员会顺利地批准了我的申请。2000年，在经过一定的修改之后，那部饱含着导师心血的博士论文终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先生欣然作序。同一年，经李剑鸣老师推荐，我的博士论文英文版也在美国格兰德出版社出版。2000年，真的是我的幸运年份啊！

张先生等南开前辈对我的关怀大大激励了我。我潜心读书，原来浮躁的心已经沉淀下来。第二年，我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张先生听说后，心情大好。

张先生本性宽厚，从不吝啬于鼓励人。2009年，当我把我的一门讲义整理，以《世界的祛魅——西方宗教精神》为名出版后，张先生说，“题目很新颖啊！”

张先生为学生做了那么多事情，却从不想给自己的学生增添任何麻烦。我说，“张先生，烟台空气新鲜，您可以到这边讲学几天。”张先生回答说，“烟台我去过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方便。”我立即没词了。

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尽管张先生学问广博，我只是从他老那里学到了很小的一部分。随手翻阅张先生赠送给我的著作，精辟之论比比皆是，说是“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之作，亦当不为过分。他老人家的为人和人品，更是后生所难以企及的，我只能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五月的暖风习习而来，五月的风景万木葱茏。在张先生八十华诞来临之际，特以此文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衷心地祝愿恩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精神矍铄似东海云鹤

身体康健如南山劲松

2011年5月15日于烟台

# 仰望星空 沐浴恩泽

——敬贺恩师张友伦先生喜迎八十华诞

毕健康

星移斗转，岁月如梭。转瞬之间，我阔别美丽如画的南开大学校园已经近 20 年。我们喜迎张先生八十华诞，点滴往事鲜活地萦绕脑际。

我与先生似乎注定有缘。

在考入南开大学之前，就得以满怀崇敬之情，远远地仰视先生。1984~1988 年，我在成都东郊四川师范学院（大概 1986 年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读书。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在这个玲珑却过分小巧的校园里，突然出现了一位大学者的身影。过去我们只能在书本上拜读他的名篇佳作的张先生，让同学们仰慕而遥不可及的张先生，出现在我们的大讲坛上。当时，先生陪同一位美国学者讲学，做全程学术口译。先生头发斑白，风度翩翩，以标准、流利的中文，极为从容地翻译美国学者的学术发言。那时，我心中的感觉是，台上的先生非但中英文俱佳，而且形象好，品味高，唯可仰视而已。

追随先生研习美国历史，凡三年时间。感觉先生是严肃的学者，在我们学生面前不苟言笑。我们 88 届的几个学生，多半有点“怕”先生。过节或是有事需要造访先生府上，我们便相约而行，结伴而往。先生极有风度地接待我们，展现出长辈的宽容与仁爱。

先生对学生宽严有度，关键时指导，必要时纠偏。有一阵子，我好像有点着魔，突然对欧洲一体化兴趣盎然。我大概读了几本书，便产生了兴趣，还斗胆地跑到我国著名的欧洲经济问题专家易梦虹府上，得以见识这位大学者平易近人的风采。几年前，在北京得知易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慨然，祝愿他在天上亦享受书香之乐。

先生知道我“跑偏”，从美国歪到西欧，及时予以指导。于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美欧兼顾”，顺利毕业。可是，我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后，失去了先生纠偏的机会，便再次“跑偏”。这一次“偏”得离谱，连工作语种都发生了改变，改习中东历史。不过，先生这次并未怪罪我，反而勉励我追随杨灏城先生认真研习中东历史。先生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京津理事会，使我再次有幸得以仰视先生的风采，感受先生的宽和、仁慈。

我这个人人生性好静，不喜热闹。大概是 1989 年吧，我受美国学者保罗·斯皮卡教授讲授的课程的影响，想搞清楚美国早期清教是怎么回事。我从美国史研究室图书室借了些书，又从斯皮卡教授那里搜罗了相关书籍，闹中取静，便不知深浅地“写论文”。初稿用英文文献堆砌起来，请斯皮卡教授审阅。斯皮卡教授认真审读后，约我到他家谈稿子。在享用他几岁的小宝贝献上的茶水后，我们谈了一个晚上。我记不清谈话的内容了。但有一点印象特别深。他说，你将来在书里不能只提 Winthrop Winthrop！我点头同意，内心深处却不以为然。我虽“少年轻狂”，尚不致于狂妄到觉得可以著书立说了。写书，是文化人的事！著述，是文化人的高尚事业。我既不是文化人，更缺少高尚品质，何以著书！不过，今天回过头想想，非常感谢和思念斯皮卡教授。

我根据斯皮卡教授的修改建议，把稿子改写成中文。或曰洋洋洒洒，或曰啰里啰唆，大约 24000 字。我不管《世界历史》对篇幅的要求，也不管论文的行文特色，以我认为好玩的书写方式，弄出这 2 万多字的玩意儿，便寄给了《世界历史》编辑部。编辑部的黄启芳老师十分认真负责，在垃圾堆里挑珍珠，居然觉得有可取之处，退回修改。我捧着稿子和黄先生亲笔手写的改稿信，诚惶诚恐地来到张先生府上。先生和颜悦色地指导我修改论文。我按照编辑部的要求，以 12000 字为最高限度，删除了一半左右的废话。我把修改后的稿件挂号寄往《世界历史》，尔后踏上了开往四川的火车，在川西南那个小山村等待 1990 年春节的到来。

1990 年冬天似乎格外寒冷。1991 年春天的鸟语花香，我也听之无声，闻之无香，我经常独自一人在南开大学博士生居住的 19 楼楼顶踟躅徘徊。在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不想让我的档案从南开大学转移到四川省人事厅，再从四川省人事厅转移到自贡市人事局，再从自贡市人事局“下放”到什么局或什么科或什么乡。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相当不乐意的事。就在这个时候，先生伸出了温暖的手。他亲笔为我写了几份推荐书！

也是在 1991 年春天，终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日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西欧北美史研究室（当时称资本主义史研究室）主任王章辉教授，乘一辆浅蓝色的伏尔加轿车来到南开园内。事先我一无所知，当时我手足无措，呆滞木讷。张先生则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满面春风地向王章辉教授介绍我的情况。

先生，引领我踏上了学问之路！

先生，引领我踏进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大门！

2011 年 6 月 2 日 北京



# 《美国历史的多重面向——庆贺历史学家 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和目录

## 前 言

李剑鸣 杨令侠

2001年5月，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师生聚会，庆贺张友伦教授七十华诞。当时，我们几位同门商议，到张先生八旬寿诞时，一定要专门编一本文集作为贺礼。正所谓日月如梭，转眼即近十年。年初，我们向张先生提出编书之议，他的第一反应是辞谢。据我们的理解，张先生为人处事向来冲淡宽和，自然不想在做寿这件事上过于“张扬”；同时，他更不愿给别人增添任何负担或麻烦，即便这次的“别人”是他指导过的研究生。我们解释说，编一本书并不费事，对我们做学生的，不过是答谢师恩于万一；而且，以书祝寿志庆，学术界早就有例在先。经我们反复劝说，张先生终于同意启动组稿和编辑工作。

按照惯例，以编书为前辈学者祝寿，有几种常见的做法。一种是约请学界同行专门撰写论文，另一种是从同门弟子已发表的论文中编选文集。我们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这主要是考虑到，想约的学者在各学校和研究机构多为骨干，工作负担繁重，每年都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指标；而论文集集中的文章，又往往不能作为“有效成果”计入工作量。再者，约稿有时间限制，在短期内写出的文章，难免带有急就章的特点。如果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挑选佳作，则更可能把有价值的论文集中起来，更好地展现同门弟子的学术水准。这种想法得到了各位同门的支持和响应。于是，这部文集很顺利地就编成付梓了。

我们这些曾受教于张先生的研究生，目前分散在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各自的学术工作中，一直谨守师训，力争无辱于张先生的教诲。在我们的心目中，张先生在许多方面都树立了标范，给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资源。

在我们的印象中，张先生是那种身教胜于言传的老师。当年我们在门下求学时，很少听他谈起他自己，包括他求学和治学的经历。我们对这些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张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求学，回国以后一直在南开大学任教。他在国际共运史和美国史领域，都是公认的权威学者。对南开大学乃至国内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他所做的工作尤多；其意义在今天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兴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张先生精通俄文，其学术生涯的最初二十年，重点研究国际共运史。很多同行最早了解张先生的学问，可能是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与国际共运史有关的几本，就是由张先生撰写的。从70年代末期开始，张先生转治美国史，并很快在英文的运用能力上，达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未能企及的程度。张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国工人运动史，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领域与他长期从事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有联

系，同时也由于他觉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必要关注美国工人阶级的经历。国内美国工人运动史最活跃的时期，正是张先生专注于这个领域的阶段。为了更深入的理解美国工人运动史，张先生先后涉猎美国农业史、西部开发史、民主政治史和种族关系史；但他在这些领域发表的论著，并不是工人运动史的“副产品”，而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同样很受学界同行的推重。

在张先生执教的南开大学，美国史是一个特色学科，长期在国内史学界享有盛誉。杨生茂教授于1964年创建美国史研究室，经过多年惨淡经营，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颇具气象。随着杨先生年事渐高，正当盛年的张先生开始操持具体事务。1986—1990年张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这期间他对美国史学科的事情，同样倾注了很大心力。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史研究室陷入低谷，老教师退休，年轻人出国，新成员尚待成长。应对这种局面，张先生殚精竭虑，一心要保南开的美国史学传统于不坠，并在困境中求得发展壮大。在鼓励和扶持年轻人成长方面，张先生用力最多，许多事迹在南开至今有口皆碑。作为承上启下的学术带头人，张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张先生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达十年之久。这个学术团体创建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是全国美国史学人共有的学术平台，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老一代学者退出研究会领导岗位之后，张先生也担负了承上启下的重任。从1986年到1996年，研究会正处在一个难题接踵而至的时期，特别是1990年研究会秘书处搬到南开以后，张先生身上的担子更重。按照他的本意，早就想从理事长的位子退下来；但出于需要和大家的信任，他一直勉力支持，领导研究会度过了难关，并且取得了新的成绩。此外，张先生还始终参与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丛书”的评审，多次担任富布赖特项目的面试专家，以不同的身份，为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做着相同的工作。

同学们当年对张先生普遍有一种敬畏感，在单独面见时，不免有些紧张和局促。这种感受来自于张先生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其实，只要同张先生有所接触，就不难发现，他待人十分随和平易。旧史称魏之管宁“名行高洁，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在我们看来，张先生正是这种“即之熙熙和易”的长者。无论是在受教期间，还是在毕业以后，我们都感觉到，张先生的教导和关怀，正如春天的微风，自然和顺，时时都给我们以美好的熏染。由于受张先生处世风格的感染，我们平时很少向他当面表达敬佩和感激之情。这次欣逢张先生八秩寿庆，终于有机会让我们展露一直深藏的心意。

这部文集的编选，得到了各位同门的关心和协助；在出版上则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岳秀坤先生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条件，本书是难以如此顺利地面世的。我们编选这部文集，除以志老师华诞之庆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对美国史研究略有损益。至于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如何，则只有留待同行和读者来评定。

## 目 录

- 前言//李剑鸣、杨令侠
- 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新教：一种文化混合体//高春常
- 清教对殖民地初期马萨诸塞政治的影响//毕健康
- “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李剑鸣
- 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宪法译文的意见//周学军
- 论美国殖民协会的性质//张聚国
- “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公众舆论观念//马凌
- 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1840—1860）//原祖杰
-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张聪
- 论美国公共行政管制的发展与变革//谭融、于家琦
- 农业人口外迁与美国的城市化//陈奕平
- 《哈里森毒品法》与美国社会的毒品问题//翟帆
- 女性、阶级与种族因素的互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史研究//倪亭
- 1913年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秦珊
- “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王慧英
- 战后初期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形成及其失败//李胜凯
- 美国与加拿大史学界对两国关系的研究//杨令侠
- 平常的经历，肤浅的感受（代跋）//张友伦
- 附录一：张友伦教授著述目录//杨令侠整理
- 附录二：作者简介

# 张友伦教授论文和著作目录

杨令侠

1. “1910—1917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教学》1963年第12期；
2. “1848—1852年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历史教学》1964年第9期；
3.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地位”，《历史教学》1979年第3期；
4. “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历史教学》1980年第12期；
5. “美国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
6. “试论19世纪美国工业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
7. “关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史学”，《南开学报》1981年第4期；
8. “他是个纯粹的人——卡尔·沙佩尔”，《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9. “约瑟夫·莫尔”，《外国历史知识》1981年第10期；
10. “试论北美独立战争的必然性”，《历史教学》1982年第8期；
11. “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12. “世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兴衰”，《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 “Philip S·丰纳教授谈美国工人运动史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14. “丰纳教授谈美国现代史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
15. “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世界历史》1984年第2期；
16. “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关于美国独立战争性质和原因的几种论点”，载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
17. “评价美国西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8. “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上）”，《世界历史》1985年第6期；
19. “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下）”，《世界历史》1985年第7期；
20. “美国劳动骑士团的兴衰”，《南开学报》1985年第3期；
21. “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建立和分裂”，《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5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 “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历史地位”，《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5期；
23. “五一一大罢工是美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里程碑——纪念‘五·一’大罢工一百周年”，《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
24. “亨利·乔治运动与亨利·乔治其人”，《兰州学刊：美国史研究专刊》1986年7月；
25. “第一国际纽约总委员会和北美联合会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国际共运史资

料研究》第 16 辑，人民出版社，1986 年；

26. “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材料”，《马克思主义来源论丛》第 7 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27. “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无关吗”，《美国研究》1987 年第 4 期；

28. “关于康芒斯——威斯康辛学派”，《南开学报》1987 年第 2 期；

29. “1877 年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重要意义”，《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 2 期；

30.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工人运动”，《国际共运史研究》第 3 辑，人民出版社，1988 年；

31. “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托马斯·潘恩”，《日美问题论丛》，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年；

32. “尤金·维克多·德布斯——美国无产阶级的敬爱领袖”，《国际共运史研究》第 6 辑；

33. “重新评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 1848 年革命中的作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34. “‘职业意识论’和六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现实”，《史学集刊》1991 年第 1 期；

35. “二战后十年间的美国社会和工人运动”，《南开学报》1991 年第 1 期；

36. “关于美国 1787 年西北法令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37. “美国印第安史学的兴起”，《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 7 期；

38. “<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序一”，《九江师专学报》，1994 年第 1 期；

39. “加拿大史学初论”，《南开学报》1994 年第 1 期；

40. “二次大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兼评美国学者关于阶级的理论”，《历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收入《20 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世界历史卷》，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年；

41.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化的开端”，载于《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42. “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再论美国西部史学”，《南开学报》，1995 年第 1 期。

43. “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关于美国和西欧工人运动的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

44. “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问题”，《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45. “美国农业的两次大突破及其基本经验”，《美国研究》1996 年第 2 期；

46. “美加贸易关系的形成及其启迪”，《世界历史》1996 年第 4 期；

47. “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48. “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99 年八十周年校庆专刊；

49. “略论水利设施对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50. “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 著作

1. 《共产主义者同盟》，商务印书馆，1963年；
2. 《第一国际》，商务印书馆，1964年；
3. 《第二国际》，商务印书馆，1965年；
4. 《巴枯宁》（署集体名，合著），商务印书馆，1972年。
5. 《蒲鲁东》（署集体名，合著），商务印书馆，1974年；
6. 《世界近代简史·上册》（署集体名，主编，作者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
7. 《世界近代简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
8. 《外国历史故事·四》（合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
9. 《英国工业革命》（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10. 《美国工业革命》（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11. 《美国农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 《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 《日美问题论丛》（主编之一），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14. 《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第一主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
15. 《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 《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作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 《加拿大通史简编》（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18. 《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后收入《美国通史》为第2卷，主编，作者之一），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 《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0. 《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 《孔见集》，中华书局，2003年；
22. 《美国历史百科辞典》（第二主编，作者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23. 《美国西进运动探要》，人民出版社，2005年。

## ◆ 书评 ◆

# 《国家干预与 1865-1935 年间的美国经济转型》评介

高春常

王书丽博士撰写的《国家干预与 1865-1935 年间的美国经济转型》(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出版),以联邦政府作用与经济转型为主线,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手段,对美国内战至“新政”时期美利坚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

作者在书中指出,美国内战到“新政”时期的美利坚实现了从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的大转型,其间联邦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动了经济巨变。该书通过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方式、将内容分为 18 章,可归为四个部分(1-6 章、7-10、12-15、16-18 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经联邦政府之手为内战融资而重塑的金融体系、高关税壁垒为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提供了金融和市场条件。这促动了资本的全国性流动,为现代工商企业的崛起、经济的腾飞、工业社会的来临创设了制度性前提。19 世纪末随着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行,联邦政府通过“州际贸易管理权”的实施,开始对铁路业、托拉斯进行管理。上个世纪之交的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嬗变为工业国,从州经济体的联合转变为全国性经济体的历程。

20 世纪初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资源保护和食品安全等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为动员全国资源而采取了与私人部门合作的“补偿性国家”策略。联邦政府的职能得到强化,起作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外部性事件把美国推上了生产性大国的巅峰,并成就了世界经济金融大国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纽约也开始逐步取代伦敦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美国政府还未能真正弄懂,还不适应,乃至不愿承担起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责任。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几乎独享了经济的繁荣,联邦政府尚不具备真正的“国际视野”。美国未能理顺与欧洲国家之间商品和资金正常流动的渠道,再加上高关税壁垒阻遏了欧洲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其结果是:欧洲国家无力还债,美国生产过剩的极端性表露无遗。这不但使得美国错失了引领世界重新构筑国际货币汇兑体系和恢复贸易往来的机遇,而且招致了严重的国内生产过剩,经济萧条,并形成了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 1929-1933 年大危机。

不过,只有在“大危机”的特定情势下,联邦政府与产业界的关系才真正清晰显露出鲜明的互补特性。“新政”是应对特定经济情势而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是应对大萧条特定情势的新举措,是美国制度传承与创新统一的典范。金融改革是“新政”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1933 年银行法》竖立起了银证“防火墙”,《1935 年银行法》赋予了联

储理事会更大的权利，联邦证券法对证券业进行了革命性规制，从而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美国金融业的格局。随着“新政”的推行，联邦政府开始在和平时期大规模、全方位介入经济生活，“管理国家”形态出现，联邦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力量推动着美国经济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新政”后的美国得以“浴火重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流强国。

最后，作者得出了结论。内战时期联邦政府重塑了银行体系，促成了投资银行业的形成并促成了全国性资本市场的形成，从而为工业化的来临提供了制度性条件。为应对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所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联邦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摒弃其“守夜人”角色，开始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到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期”，联邦政府除了对经济问题进行干预外，还初步建立起对全国性商业银行系统的监管，“社会管制”的内容也丰富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同质性达到了新的高度，而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近代西方文明“逐利性”推演到极致的反映。“大萧条”的重大历史遗产在于形象地展示了“市场调节机制万能”的失灵，也将资本主义“自发管理”时代送进了历史博物馆。1933年开始的“新政”为美国资本主义走出困境提供了一个改革路径，它通过联邦政府的强制力，自上而下地实施了全方位的制度调整，从而使美国完成了从“生产性大国”到“管理国家”的重大历史性变革。

综观该部专著可见，作者历十余年美国史教研之旅，对美国经济史诸多问题多有心得。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把现代美国银行业监管的渊薮、资本市场的构筑等难懂的内容梳理得清晰易懂，并把它们纳入经济剧变的历史进程中，看作政府作为影响制度创新的重要变量来进行解读，由此可见作者之功力。其次，该书以“国家干预”作为演进主线，为我们考量政府在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应发挥之作用提供了一种范式下的参考坐标，这无疑大大提升了该书的现实意义。第三，该书突破了单纯借重时间维度构筑的经济史结构，在考虑时间界标的同时，注重专题厚度以及各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自己对经济转型与国家干预的解读范式。可见，该书无疑是中国美国经济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之一。当然，该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譬如个别章节的内容尚显单薄，金融方面的内容较为丰硕，实体经济的内容有待充实，希望作者在以后能够有机会予以修补和完善。



## 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 开启历史学发展新阶段

刘潇潇

“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是学术界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大国需要研究外国历史。中国在闭关自守时对外国置之不理，但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国家利益，不了解、不研究其他国家就会到处碰壁。而且研究外国，不能仅研究现实问题，还要研究历史，因为现实问题说到底还是历史问题，要想进行深刻的研究就必须从历史着手。”

日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通知，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新目录最大的变化在于历史学门类下由历史学1个一级学科变为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必将对整个中国历史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世界史学科为什么需要升级，升级的过程是怎样的，升级后学科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就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对世界史学科发展进行回顾和展望。

### 世界史的历史

相对于其他学科，世界史在中国的历史较短。在鸦片战争前后，民族的深重危机迫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但很长时间内中国并没有世界史学科。世界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前校长齐世荣告诉记者，解放前中国只有西洋史（主要研究欧美）和东方史（主要研究日本和印度）学科。解放后中国学习苏联设立了世界史学科，开始对全世界进行研究。但是当时没有开展独立研究，连高校世界史教材都是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了真正的大发展时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向记者介绍：“改革开放初期是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世界史国别研究非常全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也深有感触：“直到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之前，世界史拥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3个二级学科和一大批研究非洲史、拉美史的专家。”

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将世界史的3个二级学科合并为1个，成为了历史学一级学科下8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与大多数国家的统计性学科目录不同，中国的学科目录属于指令性目录，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强制约束力。学科目录中二级学科的合并意味着经费划拨、编制设置、招生名额、课题立项都要相应地减少和压缩。此次学科目录调整使世界史学科发展受到了重创。俞金尧举例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世界通史’要上3年，而学科压缩后这门课只上1年，原因就是没有老师教授。”

## 漫漫升级路

从 1997 年学科目录颁布实施到今天已经过去了 13 年。在这 13 年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世界史的学科地位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俞金尧指出：“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是学术界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大国需要研究外国历史。中国在闭关自守时对外国置之不理，但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国家利益，不了解、不研究其他国家就会到处碰壁。而且研究外国，不能仅研究现实问题，还要研究历史，因为现实问题说到底还是历史问题，要想进行深刻的研究就必须从历史着手。”

达成共识后，世界史人开始了漫长的学科发展诉求。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人文科学学科目录修订工作小组组长，世界史学者、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高岱亲历了整个过程，他向记者介绍：“其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早在 2003 年就开始酝酿学科目录的修订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先后承担了学科目录的调研工作。转折始于 2009 年 6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协同教育部向近 1000 个单位征求学科目录修订意见，共有 202 个单位或组织提出了 634 条修订意见。2010 年 6 月，学科目录修订工作小组提交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修订草案第一稿）》，建议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从 2009 年开始调研算起，历时 1 年半，历经两上两下，世界史终于正式升级为一级学科。”

在采访中，世界史学者一致认为，此次学科升级是中国史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果。2009 年两会期间，俞金尧以政协委员身份提交了《关于建设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世界历史学科的提案》。在征求学科目录修订意见时，包括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在内的 20 所高校及研究所提议将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此项提议获得了“论证充分，学科内涵清晰，学科基础好，社会发展强烈要求”的 A 类评价。更为可贵的是，很多中国史学者也在不同场合发表文章，支持世界史学科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史哲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张海鹏曾公开表示：“我们要有世界眼光。世界史不发展，历史学必将衰落。”

## 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短暂的欣喜过后，世界史人开始思索，学科升级意味着什么，学科的未来路在何方？陈志强认为：“未来的十年，世界史学科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学科的发展空间将会大大增加，与之相伴的是研究领域、课题、人员、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如完善学科体系的建设、更合理地分配资源、加强后备力量的培养等。此外，以前我们对国外的研究着眼现实利益较多，缺乏对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必将推动这两方面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分析了研究所目前的情况，感到任务紧迫：“研究所共有在职研究人员 70 人左右，以科研为主，也承担少量教学任务，研究生招生数量每年 10 人左右。研究所目前设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室、西欧北美历史研究室、俄罗斯东欧历史研究室等机构。从表面上看覆盖了世界史的各个方面，但实际上有很多研究空白，如拉美史研究七八十年代曾经很强，但现在只有两位青年研究人员，

已成了濒危学科。高校人力、财力资源丰富，学科升级后可以扩大编制、扩大招生、增加经费投入，大踏步发展，如果我们不紧紧跟上，将难以发挥‘国家队’的作用。”俞金尧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设置新课题、新领域：“比如边疆史地我们一直是从中国的角度研究的，缺乏邻国视角的边疆研究，因此应该了解、系统研究人家的资料和政策。我们还可以开设‘周边国家史’这样的二级学科，侧重研究与中国有关的经济、文化、边疆政策的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7日第177期第3版

## 南开大学举办“美国族裔与社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张聚国

2011年6月10-12日，“美国族裔与社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8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杨栋梁教授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向与会的各位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内容涵盖美国种族和族裔研究的各个方面，如美国移民、本土美国人、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犹太美国人以及当代美国族裔问题等。会议有几个突出特点：一，国内学者对种族和族裔问题的强烈持续关注并提交论文涉及课题的多元化；二，青年学者占有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三，整体研究水平明显提高。

本次会议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国内美国历史研究学界组织的第一个有关美国族裔问题的国际会议，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本次会议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的资助。

## 东北师大举办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与文化交流会议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所 欧阳贞诚

2011年3月19日至20日，由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和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联合主办的“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与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东北三省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富布赖特项目学友、2010-2011年度来华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等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美国研究所所长梁茂信教授主持。

会议期间，中美学者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围绕过去30年来中

美两国在富布赖特项目与中美文化交流，特别是其在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探讨。具体研讨问题涉及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中美两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司法教育体系建设，美国社会问题，美国对外关系和中美关系等。

## 美国三一学院格林伯格教授和南开大学王黎博士 在鲁东大学讲学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赵慧

2011年3月27日至29日，美国富布赖特学者、三一学院历史系教授谢里尔·格林伯格（Cheryl Greenberg）女士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王黎副教授来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讲学活动。

3月27日下午，历史文化学院首先举办了一场题为“大萧条期间的美国黑人”小型学术座谈会。格林伯格教授以丰富的图片资料，对美国黑人在大萧条期间的黑人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当中穿插着王黎博士的诙谐点评以及师生的不间断提问。高春常教授主持座谈会，并接受了格林伯格教授和王黎博士的赠书。

3月28日晚，格林伯格教授在本院做了题为“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犹太人与黑人”的学术报告。作为族裔问题研究专家，格林伯格教授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切入视角，对美国犹太人与黑人族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特和深刻的梳理和阐释，并与众多的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观点交流。报告期间，王黎博士从政治学视角对格林伯格教授的报告进行再阐释和深度解读。报告由王书丽老师主持。

3月29日上午，王黎博士为本院师生做了题为“欧洲外交渊源及其对北美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王黎博士首先提出了欧洲有无共同外交的问题，接着论及欧洲外交的观念、原则和法律渊源，结合事实评论欧洲共同外交与国际影响力问题，并对欧洲外交思想渊源对北美思想的影响给予了评论。报告由张淑清教授主持。

本次讲学活动为我院师生搭建了一个与国内外学者进行交流的学术平台，开阔了参会人员的学术视野，活跃了我院的学术气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 美国三一学院格林伯格教授在武汉大学讲学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谢国荣

2011年4月15日晚上和16日上午，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大教室，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历史系教授、南开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谢里尔·格林伯格为我院师生带来了题为“美国民权运动”（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和“奥巴马时代的种族与族裔政治”（Politics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age of Obama）的两场学术讲座。讲座由“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与危机应对”70后学术团队负责人、历史学院谢国荣教授主持，近百名师生参加。

格林伯格教授先后就学于普林斯顿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教授的高足，现为三一学院保罗·瑞泽（Paul E. Raether）杰出历史教授。格林伯格教授是美国知名的种族与族裔史专家，她的专著《争吵不休的同盟：美国世纪的黑人与犹太人关系》（*Troubling the Waters: Black-Jewish Relations in the American Century*）曾荣获2007年索尔·维也纳奖（Saul Viener）最佳美国犹太人历史著作。

在首场讲座中，格林伯格教授细致梳理了美国内战以来民权运动兴起、发展的全过程。她着重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民权运动，将之简单视为黑人群体的抗争，而应结合白人群体的反应，将其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她认为，尽管黑人在内战后获得“解放”，宪法修正案也确认了黑人的自由身份，但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黑人在经济、政治、观念上的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其后的种族隔离制度与私刑泛滥更加剧了黑人的悲惨景况。经历了大迁徙之后的黑人在聚居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了新的身份认同与思考方式，各种争取民权的学说与组织纷纷诞生。罗斯福对黑人的承诺因二战而中断，但二战也成为了战后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的新起点。

在第二场讲座中，格林伯格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奥巴马的当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不能过高地评价，更不能将其视为美国“超越种族”的标志。相反，美国民众在看待奥巴马上巨大分歧，凸显了种族问题在现实政治中仍有重大影响。为数不少的白人极端分子质疑奥巴马的出生地、宗教信仰，甚至将他描绘成反基督教的恶魔。而黑人中也有许多种族主义者，一些黑人领袖并不认同奥巴马，因为他“不够纯粹”的黑人身份，因而奥巴马的当选掺杂了很多种族因素。

格林伯格教授总结道，尽管民权运动存在着暴力倾向、盲目拒斥白人等问题，但其历史成就与意义值得肯定。美国黑人的贫困率有了大幅下降，社会各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黑人精英。同时，随着全球一体化、特别是新兴传播技术的发展，美国民众的种族意识正在逐步淡化。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围绕美国黑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民权运动与冷战背景、奥巴马本人的身份认同等问题踊跃提问，格林伯格教授进行了耐心的回答与解说，现场气氛热烈。格林伯格教授融贯古今的宽广视野、细致独到的研究方法，以及在交流互动阶段风趣睿智的回答，都让同学们受益匪浅。武大历史学子精彩、专业的提问也给格林伯格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美国奥本大学翟强教授在南开讲学

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宋丹

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邀请，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翟强教授于2011年5月12日至13日来南开讲学。翟强教授1991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冷战史专家加迪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史、美国与东亚关系史、国际冷战史，出版《中国与越南战争》、《龙、鹰与狮子：1949-1958年的中美英关系》两部英文专著，在国际关系史学界获得广泛好评，并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

13日上午，翟强教授在文科楼226室作了题为“中法建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学术报告。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学功教授主持了讲座，陈志强院长代表学院向翟强教授颁发了“天津市特聘教授”聘书，正式聘请他来我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翟强教授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法建交未能实现的原因，认为印度支那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台湾问题等是这一时期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接着，翟教授通过分析6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以及两国国内的情况，认为中法建交的主要障碍正逐步消失，比如，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法国对越南政策的改变，同时，两国建交的可能性增大，中苏、美法矛盾的加剧，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总统的看法等因素使得中法建交的条件开始成熟。在第三部分中，翟教授简述了中法建交的过程，着重分析了美国及台湾方面对此事的反应，指出中国同意法国提出的先宣布建交再同台湾断交的方案，美国为阻止此事，极力劝说台湾方面尽量拖延与法方断交，以期中法建交胎死腹中，中法领导人识破其阴谋，联合将台湾驻法“大使馆”人员赶走。最后，翟教授分析了中法建交对整个国际格局及中美关系的影响，指出中法建交不仅体现了西方阵营的松动，也是对美苏霸权的反抗，它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

翟教授的报告视角新颖，充分运用了包括《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蒋介石日记”等档案资料。讲座内容丰富，开阔了学生们的学术视野，受到师生的好评。主题报告结束后，翟强教授回答了听众的一系列问题，涉及中美关系、越南战争、中法关系等。

在南开期间，翟强教授还参观了历史学院资料中心，并就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新趋势、美国大学历史学研究生的培养、学术训练、课程体系等话题与相关师生进行了座谈。

# 美国科尔盖特大学郝吉思教授、 加兰教授访问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历史系 杭 垚

2011年5月16日下午,美国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格雷厄姆·郝吉思(Graham Russell Hodges)和罗伯特·加兰(Robert Garland)应邀来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学。

郝吉思教授著述颇丰,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史,著有*Friends of Liberty, David Ruggles*等多部著作,其中《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Taxi!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City Cabdriver*)已经由王旭教授领衔译为中文,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加兰教授主要研究古典时代的历史,尤以希腊史、罗马史见长,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誉。讲座由我会理事长、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旭教授主持。

郝吉思教授首先作了题为“David Ruggles: A Radical Black Abolitionist and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in New York City”的讲座。他在阐述了奴隶制的束缚与美国式自由之间的悖论并大致梳理了美国废奴运动的历史之后,谈到了今日这种敢于挣脱镣铐的精神在美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随后,郝吉思教授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解放之路引出了主人公David Ruggles,将Ruggles称之为用一生致力于废奴事业的斗士。在郝吉思教授看来,Ruggles是一位激进的黑人废奴主义者,他认为道德劝诫的力量不足以废除奴隶制,必须要勇敢地采取实际行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废奴运动的先驱,对他的记述却十分黯淡。黑人自身的废奴抗争常常荫蔽在白人的话语霸权之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此,郝吉思教授认为非常有必要重新叙述Ruggles传奇的一生。

加兰教授给厦大师生带来了题为“Being a Roman Soldier”的讲座。他大致梳理了罗马军团的历史,指出罗马士兵招募制度几经变革,征兵条件不断放宽,并认为正是罗马人创立了现代军事生活的诸多形态。在谈及罗马士兵艰苦的训练时,加兰教授还惟妙惟肖地模仿了罗马士兵走队列和剑刺敌人的样子。加兰教授讲解了罗马士兵的装备、军纪、描绘了军队远征的情景。不仅如此,他还演示了罗马军团的不同队列,描述那些壮烈的场面。除此之外,加兰教授还提及罗马士兵的退休制度,绘声绘色地还原了他们退休后的日常生活。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在座的厦大学子提出了许多问题,两位教授也针对提问做出了精辟地回答,对于黑人废奴主义者与白人废奴主义者的关系、美国国父关于自由的认识、罗马军队的认同以及罗马军队的外籍士兵等问题提出了许多见解,发人深思。两位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精彩,现场气氛更是热烈活跃,极大地丰富了在场师生的视野,好评连连。

#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 Songho Ha 教授在东北师大讲学

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 欧阳贞诚

2011年7月5-6日，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历史系 Songho Ha 教授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作了关于“美国体制”（The American System）的两场学术报告，报告由美国所所长梁茂信教授主持。

Songho Ha 教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的美国体制观理论，即 1789-1837 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与文化政策，目的在于推动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改变原有各州之间松散的联盟状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合众为一的国家。Songho Ha 教授指出，建国初期美国的经济体制由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公共土地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支柱支撑，以期建立美国国内市场。同时，Songho Ha 教授强调美国体制中的文化建设对于加强国家认同感的意义。他认为，建国初期包括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在内的政治家们意识到文化建设对于团结各州的重要性，由此提倡建立全国性大学、博物馆及文化交流项目。

Songho Ha 教授的报告内容系统全面，研究视角新颖。主题报告结束后，就相关学术和社会问题，Songho Ha 教授还同在座的师生做了深入地探讨和交流。



## ◆会员动态◆

### 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揭晓 我会会员斩获六项

经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正式公布。世界史学科共有 48 个课题获得立项，我会会员斩获其中 6 项。

我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任东来的“1944—1990 年美国退伍军人权利立法研究”，我会理事、浙江师范大学孙群郎的“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空间蔓延的危害及其治理研究”，我会理事、西南大学黄贤全的“20 世纪美国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与政府调控政策研究”和我会理事、福建师范大学孙建党的“美国 20 世纪非殖民化政策研究”获得一般项目资助。陕西师范大学梁红光的“州权观念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研究”和湖南科技大学雷芳的“美国邦联国会研究”获得青年项目资助。

### 国务院聘请我会顾问时殷弘教授为国务院参事

2011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下发国人字〔2011〕21 号文件，聘请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为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教授曾任我会理事长，现为我会顾问。

### 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在陕西师大讲学

厦门大学历史系 杭 垚

我会理事长、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应陕西师范大学“西部大讲堂·历史学论坛”的邀请，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下午做了一场题为“20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城市化转型及其理论意义”的精彩讲座。讲座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建才教授主持，来自各地的大讲堂学子以及陕西师大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王旭教授从世界城市化转型与主要特征、以美国为中心的比较、转型后城市化的内在机制以及传统城市化理论的修正与中国城市化四方面内容着手，以美国学者或学派的名言作引，论述了 20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转型及其重大理论意义。王旭教授首先分析了城市化转型的时机和原因，并就传统城市化和新城市化进行概要对比。在详述新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时，王旭教授运用形象的图表和翔实的数据论证了新城市化在人口与经济活动、空间结构、城市与周边地区关系、中心城市功能四方面与以往的不同

之处。接着，王旭教授还以美国为中心，介绍了美国城市发展的两大阶段和世界各国出台的城市化新概念。此外，王旭教授在阐释转型后城市化的经济结构、空间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时，既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又援引美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个案实例，讲解生动。最后，王旭教授抒发现实关怀，不仅指出我国学术界的认识局限，还强调城市化转型是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

王旭教授的精彩演讲受到了西部大讲堂的学员以及西安其他各高校前来聆听的学子们的一致好评。在互动阶段，王旭教授与在场师生讨论了北京的城市发展战略、地铁建设对城市化的作用、城市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影响比重、中心城市与郊区的推拉作用等受到共同关注的问题。

## 北京大学王希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学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张聚国

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王希先生应邀于2011年6月13-16日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学。期间，王教授分别作了题为“美国大学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与发展”和“全球化和数据化时代的美国史研究”的演讲。

在题为“美国大学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的演讲中，王教授勾画了美国大学发展和转型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不同时期美国大学的特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理念与原则、美国大学的管理制度和财政来源以及目前美国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在题为“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与发展”的演讲中，王教授对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与实践、公共史学家的训练、公共史学就业领域以及公共史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引发的争论等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最后一个演讲中，王希教授阐释了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趋势、历史信息数据化及其对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影响、新形势下中国学者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并就相关问题与师生们进行了座谈。

#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在广州讲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孔庆山

2011年3月31日和4月2日，我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在暨南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做了两场题为“自由国际主义与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讲座。在暨南大学的讲座由我会理事吴金平教授和陈奕平教授联合主持，在广外的讲座由我会常务理事孔庆山教授主持。王立新教授是作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名师讲坛的主讲教师来广州讲学的。

王立新教授提出，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结束前后提出的一种外交政策思想，这一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信美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甚至扮演领导角色；二是认为美国外交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以下原则的国际秩序，即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采取自由贸易原则，在各民族国家内部治理结构中促进自治与民主，在国际政治与安全领域实行国际合作与实行集体安全，以化解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威尔逊提出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目的是按照自由主义原则改造国际秩序，实现全球变迁以建立有利于美国（民主）生存与繁荣的世界环境。自由国际主义经过罗斯福、肯尼迪和克林顿的发展，成为20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政策思想，其他外交政策思想，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保守的国际主义抑或是孤立主义都未能与其相抗衡。

王立新教授认为，自由国际主义思想顺应了20世纪的现代性发展的两大潮流，即工业化带来的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潮流（全球化）和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大众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潮流。它根植于美国的国家特性，代表了美国的国家性格，是美国对20世纪国际关系最重要、最独特的贡献。自由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美国政策改变了国际秩序与世界的面貌，如实现了国际关系的有序化，把伦理原则注入国际关系，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维护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支撑了美国的霸权；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干涉、动荡与杀戮等深重灾难，并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物质、声誉以及对美国民主的损害）。

在互动环节，王立新教授就现实主义对20世纪美国外交的影响、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中国如何对待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西方国家干预利比亚的正当性等问题回答了学生的提问。

我会副理事长、山东师范大学的王玮教授和我会理事、郑州大学的王琛教授参加了在暨南大学的讲座，并与王立新教授一起回答了学生的提问。

# 福建师大王晓德教授在广州讲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 张震山、李晶、曾颖姗

2011年5月16日，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院长王晓德教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校区实验楼大模拟法庭做了题为“关于美国外交史的几点看法”的讲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孔庆山教授主持了讲座。是日晚上，王晓德教授应邀到暨南大学做学术报告，暨南大学的吴金平教授主持了当晚的报告。王晓德教授是作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名师讲坛的主讲教师来广州讲学的。

王教授首先谈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追求。他指出，美国政治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目标的阐释，除了实现本国的攸关利益之外，往往打上了维护全人类“民主、自由、人权”的烙印，从文化视角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学者可能对这一点体会得更为深刻。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民主”和捍卫“自由”常常挂在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嘴上，使美国外交政策追求的根本目标明显具有了很浓厚的“理想”色彩。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美国那样从来都把本国的利益等同于全人类的利益，至少在表面上使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有了“普世性”的特性。

王教授认为，植根于美国主流文化之中的观念或意识无疑对美国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影响，美国外交显示出不同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正是文化观念影响的结果。美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屡屡强调的在国外促进“民主”和维护“自由”并不完全是欺世之谈，他们从心底里希望这一点能够如愿以偿，当然前提是不损害美国的现实利益或与之保持一致，因为这是美国承担的一种特殊使命，更不用说还有利于提高美国能够打压或击败对手的文化上的“软实力”。即使美国政府决策者在推行某一项外交政策时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他们也愿意把那些更具功利性的目标隐藏在这些容易引起民众共鸣和支持的“套语”之下。

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趋势，王教授作了相关的介绍。王教授说，主张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革新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应该是国际历史学家，而不只是美国历史学家；二是应该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王教授还指出，在美国外交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已经认同了用“国际史”取代“外交史”。他们的眼界逐渐从美国外交本身或政府之间的关系向着更为辽阔的领域扩展，把美国对其外部国际环境的反应以及与其外交所施加的对象的互动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研究外交史的“全球视野”既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化，但更重要的是对研究者的基本研究素质有着更高的要求，如应具备扎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对与美国外交互动国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等有一定的了解，甚至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应该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等等。

王教授从美国历史发展的几个主要特征入手，提出应该加强对美国早期外交史的研究。借用戈登·伍德的观点，王教授指出早期共和国时期“归根结底似乎对所有美国人来说都具有可感觉到的直接重要性。在美国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内，我们的政治制度被

确立，政党开始形成，一种经济制度也在运行。这是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时期。总而言之，如此多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早期共和国这一时期”。

最后，王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国际学术界颇负盛名的学者罗布·克罗斯及其著作，并就外交史研究如何与国际接轨问题进行了相关的探讨。王教授认为，对史学研究者来说，理论与方法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刻苦钻研，即使在理论和方法上寻找到了研究路径，也很难做出超出前人或影响较大的学术成果。史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坐“冷板凳”的精神，少一点“浮躁”，多一些“耐心”，不受或少受外界的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把理论思考建立在对原始档案释读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中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才能不断地走向深化，在不远的将来真正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

在互动环节，王晓德教授就美国文化本质，西方文化和思想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回答了学生的提问。

## 厦门大学盛嘉教授在南京大学讲学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曾 全

2011年5月11日下午，盛嘉教授在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匡亚明报告厅为中心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讲座，题为“革命的越境与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眼中的美国革命（The Bounda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盛嘉教授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有意思的是，盛嘉教授的学士学位竟是在辽宁大学获得的物理学学士，看来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爱让他最后选择从事历史学研究。

盛教授介绍了1942至1946年延安时期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献史，当时《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持续介绍和诠释美国革命，美国革命被描述成普世性和为自由为争取正义的革命。甚至在1944年7月4日，胡乔木（时任毛泽东主席政治秘书）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但是在延安时期人物的回忆录里，他们很少提及美国革命在延安的诠释，毛泽东回忆录及其史料也很少提及这个时期的党对美国革命的认可。因此，这就引发了一场争论，那就是1942年到1946年这个时期对美国革命的赞颂是否是带有功利主义的宣传呢？

盛教授认为，不否认当时延安对美国革命的赞颂是要获得美国政府的援助，但是这种赞颂不单单只是功利主义。盛嘉教授指出，美国开国之父们所领导的革命鼓励了处在全国政治权力边缘的共产党人，所以宣传美国革命会给共产党提供一定的合法性。此外，美国革命的确影响过毛泽东等人的思想，首先毛泽东等人受到美国开国之父的个人英雄主义影响，比如毛泽东个人就很崇拜华盛顿。其次，华盛顿的游击战策略影响了毛泽东

战争策略。最后美国的自治经验也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比如 1920 年年底用联邦制来讨论湖南自治，要成立湖南共和国。但是之后，毛泽东放弃了美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反而转走苏联革命方式，这是由当时冷战等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单纯地说 1942 至 1946 年的对美国革命的宣传是功利性的政治宣传。

## 中国社科院徐再荣研究员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做学术报告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西欧北美研究室

2011 年 5 月 20 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美国东西方中心富布赖特访问学者（2010-2011）徐再荣应邀在该中心做学术报告，来自东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学的 40 多名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徐再荣的学术报告题为《布什政府的气候政策：延续还是变革？》（U.S. Climate Policy und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Continuity or Change?）。该报告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气候变化问题在美国的演变，着重探讨了小布什时期美国气候政策的形成因素及主要特点，同时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历史延续性与独创性。徐再荣就美国气候政策历史演变的特点、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原因、美国气候政策与能源安全的关系、美国气候政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与与会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 ◆ 新书讯 ◆

###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出版两部新著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恩铭著《美国社会文化》(英文版)教材于2010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旨在为中国的美国文化爱好者提供一幅以美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为主线、以美国民族特性和行为方式为内容、以美国社会结构和地区特色为衬托的“美国社会文化全景图”。全书由十五个章节组成,涉及民族性、宗教、价值观、信条、区域文化、流行文化、大众媒体、家庭婚姻、商业文明、教育理念、社会服务和美国国民性等方面的内容。

王恩铭教授主编《美国文化教程》一书于2011年4月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包括政治文化、宗教信仰、教育理念、经济观念、都市文化、民族特性、家庭与女性、种族关系、区域文化、社会福利、文学特色和思想文化等多个侧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全貌。

### 厦门大学洪文迁博士新作出版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洪文迁新著《纽约大都市规划百年——新城市化时期的探索与创新》一书于2010年12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纽约大都市区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纽约的城市发展和规划一直走在美国前列,自建国后不久,纽约就成为全国首位性城市并一直保持至今。较之其他大城市,纽约更早经历了移民潮、工业化、城市化和郊区化,并面临随之而来的城市问题。本书以美国城市化进程为背景,以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规划影响因素为主线,系统梳理了20世纪纽约规划实践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美国城市规划的传统和特点,并探寻新世纪美国城市规划的发展趋势。本书是我会理事长、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旭教授策划主编的《新城市化丛书》之一部,结合了历史学与城市规划学,对百年来纽约大都市区的规划与发展提出了独到见解。

◆会议预告◆

第十四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暨  
“全球视域中的美国史研究”学术讨论会通告  
(第一号)

尊敬的\_\_\_\_\_先生/女士:

经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会决定,第十四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由上海大学历史系承办,这是我会首次在上海举办年会。上海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上海大学创立于1922年,于右任为首任校长,1994年经四所院校合并而成。鉴于您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诚邀您在世博后来上海大学共享学术盛会。

会议主题是“全球视域中的美国史研究”。本次年会的学术讨论拟采取专题讨论的形式,鼓励参会者自行组织相关研究领域的会员组成专题讨论小组。感兴趣的会员可自荐担任小组主持人,向大会会务组提交选题申请,并联络三人以上相关领域的会员撰写论文。

二、注意事项

- 1、召开时间: 2012年5月下旬、上海大学(宝山校区)。
- 2、欲组织学术专题讨论小组者,请在2011年10月31日之前向会议秘书处提出组织申请,包括专题题目、参加者的姓名。
- 3、请其他与会者在2011年11月31日前提交会议论文的题目和摘要(300字左右)。
- 4、请与会者在2012年3月20日前提交会议论文全文。格式请遵照《历史研究》的相关凡例。
- 5、回执: 请于2011年10月31日寄回回执,以便安排住宿。
- 6、会议联系方式  
(1) 联系人: 上海大学历史系  
夏正伟(手机: 15800389083)  
孔宁(手机: 13918264009)  
(2) 联系电话: 上海大学历史系电话(传真) 021-66133310  
(3) 会务电子信箱: mgsshda@163.com  
xiashw@163.com  
(4) 信函: 上海市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夏正伟 孔宁 收 邮编: 200444

会议回执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11年6月20日



# 第八届美国研究网络年会暨“美国‘软实力’与社会平等”国际研讨会预通知

尊敬的\_\_\_\_\_先生/女士

中美两国之间有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 20 世纪后半期，两国关系经历了长期而频繁的起伏，其中既有惨烈的军事冲突，也有多年友善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 1990 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其“软实力”理论后引起全球的关注。在“软实力”理论中，价值观念、政治文化与社会平等诸要素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和奉行民主原则的国家之一，它为所有人兑现其支持平等、自由和公正的诺言的努力增强了美国利用“软实力”影响其他国家社会与政治发展的能力。如果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概念的意义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软实力”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替代硬实力？美国政府又是如何运用“软实力”来推进美国的利益的？社会平等特别是种族与性别平等与美国的“软实力”有何关系？美国政府在如何推进并发展自己的“软实力”？美国的“软实力”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美国学术界怎样看待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学术界如何认识“软实力”理论？面对诸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将于 2011 年 9 月 23-25 日（9 月份的第四个周末）与美中教育基金会，在中国长春召开第八届美国研究网络年会暨“美国‘软实力’与社会平等”国际研讨会。会议组织者诚邀国内外有兴趣的学者参与讨论。有关会议的细节介绍如下：

## I. 会议主题

1. “软实力”理论及其在中美学界的相关研究
2. 美国“软实力”的扩张及其全球性和地区性影响
3. “软实力”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历史与未来
4.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美国种族、性别平等与“软实力”的关系
5. 宗教与美国文化中平等要素的关系
6. 中国的美国研究：回顾与展望

## II. 时间、地点和会议费用

- 1、会议时间：2011 年 9 月 23-25 日（周五、周六和周日）
- 2、会议地点：清华宾馆
- 3、会议费用：凡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免收会务费，食宿费用由会议提供，往返交通费自理。

## III. 会议联系方式

- (1) 传真：0431-85098034（联系人：郑升滨）
- (2) 电邮：asn\_2011@126.com; meiguosuo123@yahoo.cn

(3) 信函：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高 嵩 欧阳贞诚 老师收 邮 编：130024

#### IV. 报名与提交论文时间安排

凡有意参加本次会议的同仁，请按照如下时间提交回执和论文摘要等。

(1) 请于 2011 年 7 月 10 日前将填写好的回执（见下页）通过电邮或普通邮件寄回会务组。

(2) 请在 8 月中旬将论文摘要（800 字左右）或论文全文发送至会务组。

(3) 会议语言为英语。

(4) 会务组将在 8 月 20 日之后开始编写详细的会议日程和分组讨论议程。

(5) 有关会议的详细信息，将会适时发出通知。

欢迎各位同仁拨冗莅临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美中教育基金会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 2011 年美国研究网络年会暨“美国软实力与社会平等”国际研讨会 2011 年 9 月 23-25 日·中国长春

#### 会议回执

姓 名		性 别		职 称	
所在单位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论文题目					
备 注					

## 编后记

2011年5月8日是我会顾问、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的八十周岁生日。张友伦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他长期担任南开大学美国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为推进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他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对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赢得了广大同仁的尊敬和赞誉。本期通讯设专栏为张友伦先生贺寿。

专栏头两篇文章是张友伦先生学术生涯的自述，讲述了张先生在专业上的成长之路、治学之道，字里行间体现了张先生潜心学问、勇于探索的精神和风格，这种献身学术的人生境界，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和大师风范，值得广大同仁从中吸取精神养分，将其保留和传承下去。“平常的经历 肤浅的感受”原为《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的代跋，“张友伦先生自述”是对前文的补充。

张友伦教授教书育人三十余载，桃李盈门，张门弟子们也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恩师的深深谢忱。除了出版文集《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之外，原祖杰、秦珊、张聚国、杨令侠等详细回顾了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和史学成就，李剑鸣、陈奕平、高春常、毕健康等记述了在张先生门下求学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字使我们对张友伦先生的为学、为师、为人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悟。

6月10日上午，张门弟子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为张友伦教授举办了贺寿会。贺寿会由杨令侠教授主持。张门弟子向张友伦先生赠送了礼物，李剑鸣、原祖杰、陈奕平、周学军、高春常、毕健康、李胜凯、张聚国、谭融、秦珊、马凌等高足先后发言，深情回顾了张先生身边的往昔岁月，表达了对张先生的感激之情。南开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教授等院领导、张先生的老同事陆镜生先生和林静芬女士、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韩铁教授和赵学功教授、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等回顾了与张先生的交往经历。我会秘书长韩宇宣读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王旭理事长的贺信，并赠送了贺礼，代表广大会员表示了对张先生的衷心祝贺。最后，张友伦教授对弟子们的深情厚谊表示感谢，并赋诗一首。

这里要感谢张门弟子为本专栏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杨令侠教授。感谢徐国琦教授寄来的贺寿文章。你们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有机会表达对张友伦教授的敬意。

最后，诚挚祝愿张友伦先生和中国美国史学会的年长学者健康长寿、永葆青春！

2011年9月1日